



新四军第五师历史陈列馆于2015年正式开馆,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姚家山风景区。该馆的主题是“砥柱中原”,着重讲述了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崛起于武汉沦陷后的中原敌后战场,筑起抗日的坚强堡垒,为赢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光辉历史。

目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陈邂馨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光 朱向梅
杨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鹏 甘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陆建军 陈立新 郑学军
姚四平 曾艳红 谢受贵 窦梅
潘红莲

主编：陈国方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濛

编辑：严濂 郑雅飞

特约编辑：华蕾 张川蕾

游迎

封面设计：王鹏

红色印记

<<< <

4 红色堡垒——姚家山新四军第五师机关驻地 / 赵天鹭

文化传承

<<< <

9 我的父亲和他的善书人生 / 袁中秋(口述) 宋艳(整理)

商聚汉皋

<<< <

14 我的“长征” / 王木甫(口述) 严濂(整理)

21 转型年代的创业奋进 / 吴华林(口述) 李星(整理)

精工匠心

<<< <

25 为生者权为死者言 / 韩煦(口述) 白爱萍(整理)

委员天地

<<< <

29 心中有梦, 做公平正义的践行者

/ 张霞(口述) 唐红漫(整理)

33 在光影与建筑中寻找城市的无限可能

/ 蔡新元(口述) 郭佩珊(整理)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 O N T E N T S

2021年第11期(总第349期)

往事漫忆



37 百湖一城半生缘 探得武汉“湖泊图” / 陈红梅

史海钩沉



44 清末湖北新型知识分子与辛亥武昌首义 / 张笃勤

50 罗马尼亚话剧《失去的信》在汉排演一波三折
/ 庄桂成 赵亚琪

人物春秋



54 张金保: 纺织女工主持党的五大闭幕式 / 陈礼才

都市史话



57 汉口总商会大楼百年风云 / 殷莎

61 湖北省立图书馆西迁记 / 彭余焕

主 管: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 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 《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 《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 CN42-1056/K

印 刷: 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28日

定 价: 8元

地 址: 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246号

邮 编: 430010

电 话: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zsl@163.com

红色堡垒——姚家山新四军第五师机关驻地

◇ 赵天鹭

姚家山村位于黄陂区蔡店街道，距武汉中心城区 90 公里，群山起伏、地势险要，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红色堡垒”。

1940—1946 年，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五师司政两部，以及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曾在此驻扎，与当地村民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抗战乐章。村内至今仍保留着新四军第五师司政机关大礼堂、参谋处、后勤部、医务室、被服厂、印刷厂、枪械所、李先念旧居等 10 余处革命遗址和一批革命历史文物，享有“武汉抗战第一村”的美誉。

逐鹿中原：新四军挺进豫鄂边区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同年 10 月，国共两党经谈判达成协议，南方湘、赣、闽、粤、浙、鄂、豫、皖 8 省边界 13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

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8 年 10 月，武汉及周边各县被日军占领后，豫鄂边广大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揭竿而起，创建抗日游击队，点燃了武装抗日的烽火。11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决定组建一支部队挺进武汉外围敌后，以迅速打开周围地区的抗战局面。是年冬，党中央派李先念率领一部分干部由延安向华中进发，于 1939 年 1 月抵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他们同豫鄂边区党委一起，以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为主体，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独立游击大队随即离开竹沟，向鄂中地区进发。6 月，李先念率部与陈少敏率领的信阳挺进队在安陆赵家棚会合，随后成立了新四军豫鄂游击独立支队。

1940 年 1 月，根据中原局的指示，豫南、鄂东、鄂中地区的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鄂

豫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刘少卿、任质斌分别担任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后,迅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了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为参谋长,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

新四军第五师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艰难时刻,创建、发展起来的一支英雄部队。以李先念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高举抗日大旗,大胆深入到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武汉外围敌后地区,动员和依靠边区民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新四军第五师在长期孤悬敌后的情况下顽强奋战,在广袤的中原敌后战场上筑起了抗日的坚强壁垒。至1945年8月,建立起拥有5万余正规军和30余万民兵的武装力量,先后作战1260余次,歼灭日、伪军4.3万



李先念率部南下挺进武汉外围

余人,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的进攻;创建了一块横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界的根据地,拥有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1300多万人民,建立了8个专区和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实现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新四军第五师对日、伪军作战主要战绩统计表

| 时间 | 作战次数 | 歼灭敌伪军兵力 | | | | | 主要缴获物资 | | | |
|----------------|------|---------|-------|-------|-------|-------|--------|-----|------|-------|
| | | 毙 | 伤 | 俘 | 投诚 | 合计 | 各种炮 | 掷弹筒 | 轻重机枪 | 长短枪 |
| 1939春—1940.7 | 281 | 2624 | 8046 | 1271 | 2650 | 14591 | 11 | 32 | 140 | 5944 |
| 1940.8—1941.7 | 146 | 1012 | 4272 | 1729 | 2592 | 9605 | — | 7 | 57 | 1001 |
| 1941.8—1942.12 | 355 | 732 | 931 | 1157 | 127 | 2947 | 8 | 8 | 41 | 1236 |
| 1943.1—1943.12 | 224 | 531 | 1296 | 751 | 2718 | 5296 | — | 9 | 41 | 2522 |
| 1944.1—1944.12 | 187 | 538 | 421 | 1542 | 1200 | 3701 | 12 | 9 | 22 | 1268 |
| 1945.1—1945.8 | 69 | 475 | 1260 | 3562 | 2335 | 7632 | 12 | 6 | 43 | 3513 |
| 总计 | 1262 | 5912 | 16226 | 10012 | 11622 | 43772 | 43 | 71 | 344 | 15484 |

(资料来源:《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

红色堡垒：新四军第五师进驻姚家山村

在大悟县与黄陂区之间有两片山峦，中间由一条花园至夏店的公路隔开。公路以北是大悟山，以南是小悟山，又名姚家山。开辟大小悟山根据地，不仅可以对武汉形成战略包围，也可以作为向东发展与新四军其他部队相连接的前进阵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完成创建后，随即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制定了坚守鄂中、开创鄂东、东进大小悟山的战略部署。

1940年1月，李先念、刘少卿率鄂豫挺进纵队第一、二、三团主力，从安陆赵家棚出发，跨越平汉线，进击大小悟山。此时在姚家山一带驻有顽固反共的国民党第十九游击纵队第四挺进支队刘梅溪部，以及伪独立第二十一师杨希超部等几千人，是挺进纵队东进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障碍。4月18日，大小悟山最后两个重要地点歪歪寨和望府山被新四军攻下，纵

队指挥部机关和边区党委进入大小悟山，姚家山成为部队和地方党委的指挥中心。以大小悟山为中心的陂孝礼（黄陂、孝感、礼山）根据地，与中共鄂东地方委员会开辟的黄陂、黄安南地区连成一片，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6月2日，国民党桂系第七军两个团及国民党鄂东游击第十六、十九纵队共1万余人分数路反扑大小悟山，在予以还击后，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全部转移到平汉路西。

1941年2月，为接援皖南事变中突围的新四军部队，李先念派第一、二团东进，配合鄂东独立团，打击鄂东反动武装。2月17日收复大小悟山根据地，姚家山第2次成为鄂豫边区首脑机关的指挥阵地。9月，李先念率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十四旅歼灭国民党军保一旅旅部和保一旅第二团、三团各一部以及黄安的自卫队，第3次进驻姚家山。10月后，新四军第五师的军政首长离开姚家山，但此地依然是稳固的后方基地。新四军第五师司政两部经常来姚家山驻

扎，昼伏夜动，仅1943年就常驻半年之久。

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领导机关进驻姚家山后，在这里修建礼堂，开办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设立鄂豫工农银行以及边区印刷厂、医院、枪械所、被服厂、卷烟厂、榨油厂等，建立起良好的军民关系。李先念、陈



新四军第五师司政机关大礼堂旧址

少敏等领导同志待人和蔼，与民众亲密无间。各驻地连队每到农忙季节就帮助民众抢种抢收，对缺衣少食的贫苦农民、干部，或捐献衣物，或让他们同部队一起就餐。民众患病，也可到部队卫生所免费就诊。1941年大荒，姚家山颗粒无收，百姓挖葛根充饥。李先念从边区拨一批救济款和粮食，发给民众度荒。

每逢节日，部队还会邀请民众做客，军民欢聚，鱼水情深。

姚家山人民在战争年代，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1942年阴历八月间，国民党桂系军队进攻边区，新四军第五师司政两部决定转移，需炒米粉作行军口粮。民众在得知部队库存粮食不足的内情后，主动将碾好的几千斤白米借给部队。新四军第五师返回后，立即还清了所借粮食。部队每次转移时，村里的青壮年都争相报名，自愿组织起来帮助部队运输物资。他们同新四军将士一道跋山涉水，有的人坚持运送物资长达两个月才返回村庄。部队不便携带的笨重物品，则由民众分散收藏。

“顽军”侵入后，发现村内都是老弱妇孺，便抓住村民严刑拷问。见村民拒不回答，“顽军”气急败坏，窜入农户家中翻箱倒柜，将财物洗劫一空。同年12月，日军集结第三师团全部以及第八师团、第四十三联队和伪第十一师一部，共计12000余人，兵分13路向大小悟山逼近。新四军第五师



李先念、陈少敏旧居

向敌后穿插，实行战略转移，民众空室清野。在敌人实行的“扫荡”中，姚家山被轰炸和烧毁的民房达90%以上。

新四军第五师再返根据地后，全力帮助村民重建家园，向受害村民的家庭发放了抚恤金。抗战时期，姚家山村及周边地区的人民积极参军参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据黄陂区民政局提供的资料，仅在册的烈士就达40人。

老区新貌：打造国家级旅游景区

1949年后，李先念一直对老区人民思念关怀。他曾多次过问姚家山的建设和发展情况，曾派湖北省副省长夏世厚、武汉市委书记王群亲临姚家山，为当地修建水库和农田设施，极大地改善了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1978年，姚家山人民为表达对李先念的怀念和感激，特地精选了一些自种的土特产寄往北京。不久，一封盖有国务院公章的信函寄到姚家山。信中写道：

“你们寄来的姚家山的特产白木耳和云雾茶，李先念同志收到了。他委托我们感激姚家山人民，并代为问好！根据党中央关于不接受任何礼物的规定，先念同志要我们将原物如数退还。希姚家山人民在‘四化’建设中作出新的贡献！”

为弘扬老区精神、传承革命光荣传统，武汉市人民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将新四军第五师司政两部机关旧址、李先念和陈少敏同志旧居等列为市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和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2年，蔡店街道积极探索“红+绿”致富之路，依托红色文化打造“武汉抗战第一村”，依托绿色资源打造“武汉湿地风情第一谷”香溪谷，姚家山的建设和发展由此进入新的阶段。同年4月，姚家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挂牌成立，集老区扶贫、景区开发、新农村建设为一体的综合旅游项目正式启动。外出务工的村民闻讯纷纷返乡，筹办“农家乐”，或开展种植养殖。

2015年，历时3年、投资8亿元，按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标准建造的姚家山风景区首次对外开放。在恢复、修缮新四军第五师机关旧址群的基础上，还兴建了新四军第五师历史陈列馆。陈列馆总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分为3层，设有1个序厅、6个基本陈列展厅、1个临时展厅和1个多功能厅。

陈列馆的主题为“砥柱中原”，以大量历史图片和珍贵文物为基础，结合现代技术手段，采用“以人述事、以事述史”的方式，彰显了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战期间独立支撑武汉外围敌后抗战的百折不挠、骁勇善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周边的东谷茶禅文化体验区、西谷农耕湿地观赏区、南谷森林越野区、北谷休闲

农业观光区和源泉村温泉休闲生活区5个景区，也在随后几年陆续开放，形成了“红+绿”旅游模式的经典范本。

目前，姚家山全村下辖4个自然湾，村内共计约200多户、850多人，经营“农家乐”村民20余户。村内传统建筑复现了明清徽派建筑风格：石头墙基，白墙黑瓦，屋脊陡峭；前厅后院，中间天井，巷道深远。老宅门前多为青石板路，随处可见石墩、石磨、石舂、石臼等古老农具，散发着古色古香的气息。

依托红色文化和绿色资源，全村2018年实现脱贫，2020年人均年收入达到1.6万元。景区年游客量在30万人次以上，带动百余名村民就业，同时村民享有景区年终分红，真正从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中得到实惠。鲜明的革命红、醉人的生态绿，为姚家山村打开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通道，一幅“产业兴、农民富、农村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赵天鹭：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我的父亲和他的善书人生

◇ 袁中秋（口述） 宋 艳（整理）

引 子

善书，是一种通过说唱结合的方式来传递“善”文化的文艺曲种，曾广泛流行于江汉平原。

说唱艺术的历史十分悠久，据四川天回山古墓出土的“说唱俑”所析，远在汉代就有萌芽，至唐代出现了散韵相间、说唱并茂的“变文”和“俗讲”。宋元以后，说唱艺术种类日益扩大，明代永乐年间便有“钦颂善书”印行天下。此后，善书一步步向世俗化、文学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历史故事为内容，以善恶报应为主题，既具有强烈道德教化意义，又极具观赏性的演唱形式。

辛亥革命以后，北方的善书逐渐消失。而在南方地区流行的善书，也由于因循守旧

承袭了呆板的演出形式，加上不注重发展和壮大艺人队伍，至解放前后相继被本地形成早于善书的其他曲种，如鼓书、评书、小曲所淘汰，渐趋衰亡。唯有武汉和孝感部分地区的艺人坚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曲种。如今，善书因为现代文化生活方式的改变，演出市场逐渐萎缩，已近濒危，只在武汉蔡甸区索河街和相邻的汉川还有所保留。

我的父亲袁大昌，国家级非遗项目善书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的人生三起三落，一切都源于善书。

—

我的父亲是个遗腹子，1928年出生于汉阳县索河镇（现蔡甸区索河街）新庄村。按理说，像他这样的出身，是不可能有什么

求学机会的。但我的奶奶很开明，生活再苦再难，也坚持送她唯一的儿子上了私塾，而且一上就是8年。直到14岁那年，父亲下学成为一名农民。

我们这个地方临近汉川县（现汉川市）马口镇，农闲时兴讲善书。在自家的稻场上或村里的街市口搭个草台，请四五个说书人，讲个姻缘巧配、忠厚获报的历史故事什么的，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很受欢迎。当时，我们自己屋里有个姑爷爷是个讲书的，叫邓流海，肚子里有点墨水的父亲经常到他那里拿书看。他藏有几百本书，我父亲都拿过来看过。地方上或者周边有人请他去讲书，父亲也会巴巴地跟着。这个姑爷爷看我的父亲如此喜欢善书，就介绍给袁东初先生学徒。袁东初是索河、汉川一带有名的说书先生，当时已年逾六旬，父亲是他最小的一个徒弟。

或许是因为肚子里有些文墨，抑或是对善书艺术天生的热爱，父亲学习善书进步很快。别人要用五六年才可以出师，他不到一年就可以登台说书。1947年秋，父亲跟

随袁东初先生在索河表演善书，恰逢汉川最具盛名的善书艺人王海元老先生也在此地说书，而且台挨台不到半里之隔。这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擂台赛，功成名就的老者可能不以为意，可是少年意气的父亲却暗下决心，要一决高下。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天高气爽的好日子，索河街上正逢大集，人流拥挤。父亲他们表演的是《七层楼》，袁东初师父主讲，他主宣。一场书下来，父亲这边的观众明显比王元老先生的那边多，而且台下的很多观众都表示喜欢父亲的表演，因为父亲喉音好、底气足、声音亮、吐词清。

父亲一生表演过无数场善书，可他永远记得这场演出，因为这场演出打响了他在善书圈中的名声，更奠定了一辈子从事善书艺术的信心。

父亲在袁东初先生手上学艺不到三年，袁先生就因病去世了。这时父亲又际遇了他的第二位师父——傅好安。傅好安先生也是汉川一带有名的善书艺人，他出于爱才之心，就访到家里来，还是由邓流海先生做

中，父亲在傅好安面前参了师，做了他的徒弟。父亲跟着傅好安学徒不到一年，年事已高的傅先生就想把台子交给父亲，让父亲掌案。

掌案不是一个轻松的活，用父亲的话说必须是一个“全换膀子”。一个善书班子少则两三个人，多则四五个人，表演时往往各有专长各有分工，只有掌案必须讲、宣、对、答样样精通，这样才能撑



《索河善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袁大昌

得起台面，才能在队友出状况时救得起场面。而且作为掌案，他会的书也要比别人多，主家点的书，别人不会的，掌案必须会，不能扫了主家的兴。

傅先生第一次让父亲掌案，讲的是根据《百家公案》中《判两家指腹为婚》改编的一出《血手印》，一共三个半钟头的书，父亲没打一个哽，整台节奏、气氛都掌握得极好，受到主家的奖励。傅先生这才放了心，让父亲做了掌案。

解放后，人们的生活已渐渐有了保障，听善书的风气便越来越盛。很多人找到家里来请父亲去说书。汉阳这边六个镇，侏儒、永安、蓼山、玉贤、大集、索河请的人最多，在汉川那边马口、窑新、湾潭、窑口……隔五六十里路都到家里来请。请出去后少则十天半个月，多则大半年才能回来。在外面那是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接着讲，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转着讲。

有一次在曹家河，那时叫作光明大队和红星大队，那里行武的人蛮多。因为争抢父亲的善书班子去他们大队说书，拿起杆子、铁尺差点打了起来。父亲答应他们一个队里演三台，才把这件事情了结了。

“文革”开始善书被禁，那时父亲手上还有二三十个订单没有演。

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文化政策开始拨乱反正，文化生活慢慢复苏。曾经作为封建残余而被禁演的善书，重新受到重视。

这时的父亲已年逾 50，先后在村里做



袁大昌所持有的 1980 年代民间艺人会员证和湖北省民间艺人演出证

过 9 年会计和 10 年业务员。他虽然十分渴望重返善书舞台，但又担忧违反国家政策而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给了他勇气。那便是汉阳县文化局副局长吴学超，他找到了父亲，做通了父亲的工作，并亲自为他办理了民间艺人演出许可证。而接下来的一件事，更是给了他莫大的荣誉和鼓励。

1980 年，父亲应邀参加汉川善书艺人会，此次会议共有 83 人参加，盛况空前。为期三天的善书艺人会结束，父亲因技艺突出被评为模范艺人。会后成立了一个由 5 人组成的善书改革小组，父亲被推举为组长。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将自己演讲的案本进行了整理和抄录，删改了其中不健康的内容，并根据记忆让已散失的案本重现。

这是父亲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虽然他在善书界从来不缺声名，但这一次他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重视。

在政府支持下，善书市场很快就复苏起来。父亲又变得非常忙碌，常常不着家。汉川那边是讲春书，父亲大年初四出的门，一直要讲到湾潭、西江那边，回来时往往都

开始出谷了。汉阳这边呢，父亲总是穿着汗衫、衬衣出门，到了冬月才能回来。1983年，是父亲说善书最勤的一年，那一年他待在家里的时间仅有17天。

除了营利性演出，父亲的公益性演出越来越多，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1984年，父亲与汉川艺人王家瑞合作的《梅花记》参加全省百花书会，获创作和演出奖。1987年，由父亲改编并主讲的《打碗记》参加“武汉之夏”会演，其作品和表演获得广泛的好评。

难得在家的日子，父亲也从来不曾闲着。因为“文革”，他手里的案本全部销毁了，说书人靠的就是案本，没有案本怎么办？父亲开始夜以继日地收集、整理案本。每次在家他都要整理好几个案本，下次演出时，他一起带去。

后来响应政府的号召，父亲在改编、移植一批书目的同时，根据当时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创作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善书。

一个案本少则一两千字，多则七八千字，父亲用软笔小楷手写了500多本，其中1/3是默写的固本，2/3是原创。当时5角钱一支的软笔，父亲写坏了一支又一支。

群众喜欢听父亲说书，常常点名要他上台。因为他讲的书，轻重缓急拿捏得很好，人物性格也刻画得生动真实，总能让人入戏甚至掉泪，因此感化了不少人。

有一次，父亲在蔡甸玉贤表演善书，过了三天，一个老婆婆买了两盒烟来感谢他。原来是父亲说的一出《金玉满堂》把她的媳妇教好了。过去那个婆婆吃的是残菜剩饭，穿的是破衣烂衫，听了父亲的善书后，媳妇给了婆婆5斤粮票和5块钱，让她到街上去过早，还把她的铺盖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

还有一次在汉川丁集，父亲在那里讲《吉祥花》，里面有个三媳妇，她不仅把两个嫂子劝好了，而且改变了整个村湾的风气，使得乡邻和睦。刚好当地两户人家要挖甘蔗窖，因此起了争执差点打起架来，一个六七十岁的爹爹就在旁边劝说：“你们昨天是怎么听书的，《吉祥花》里面那好的姑娘你们有学到，为了个甘蔗窖还拿刀动斧。”一句话就把事情压下来了。

进入新世纪，善书市场开始萎缩，父亲跑场子演出的机会少了，便主要在马口镇电影院驻演，一场演出大约三个小时，三四个说书先生轮流上场。听众从几十人到上百人，都是附近的老人。

三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全球掀起了挖掘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热潮。我的父亲很快便感受到了这股热潮。

2005年，善书作为我国传统的曲艺形式，引起了日本山口大学阿部泰记教授的兴趣，他带着他的留日学生林宇萍来到湖北，寻访善书遗迹。在华中师范大学刘守华教授的安排下，阿部泰记分别在汉川城关和马口镇观看了两场善书演出。其中在马口电影院观看的就是父亲表演的《打碗记》。这场演出给阿部泰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后他又多次登门对父亲进行采访，并据此撰写了一篇专题调查报告。

阿部泰记的这次调查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2006年首届国际善书研讨会在汉川召开，父亲受邀参加。这次会议不仅促进了学术界对善书的重视并形成一批研究成果，而且让更多人认识到了这个古老的艺术



2005年日本山口大学教授阿部泰记（左二）拜访袁大昌（右二）

这个时期父亲的善书演出已经很少了，一是年纪太大了，二是因为看的人太少，也赚不了多少钱。所有的演出都成了公益性的，每年只有个两三场。2012年，父亲被评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后，他带着徒弟在蔡甸城关文体广场进行了一次展演。一个半小时的演出，让很多曾经听过善书的老年人感到亲切，也让从未听过善书的观众第一次感受了善书的魅力。

形式。这一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全面展开，善书以其突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非遗保护项目。

可是这件本来让人高兴的事情，却让父亲很不开心。原来这次申报是由汉川政府主导的，由于我的父亲是蔡甸人，所以没有将他作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纳入保护范围。这让曾经为汉川善书的挖掘整理保护做过很多工作的父亲很受伤。

好在2010年由蔡甸区政府申报，索河善书被列为武汉市第三批非遗保护项目。同年，蔡甸区政府出资从父亲收集整理的500多个善书案本中，选取27个故事出版《索河善书选》。父亲的名字第一次印在正规出版物的封面上，这让父亲感到特别的满足与自豪。那段时间，父亲又忙了起来。他忙着配合非遗部门的各项保护工作，一方面抓紧时间编写整理善书案本，一方面忙着录制各种抢救性、保护性的专题片，还要接受各路媒体采访及配合各方高校调研。

这是共和国成立以后，善书第一次走进蔡甸城关，也是最后一次。2017年，90岁高龄的父亲溘然长逝。他是那么想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可是生前却找不到一个愿意继承这门艺术的年轻人。如今的索河，善书艺人不到三人，且都年老体弱，善书传承岌岌可危，这成了他最大的遗憾。他唯独留下了一个字一个字手写的500余本善书案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有那么几个有缘人，重拾善书艺术并发扬光大。

（袁中秋：袁大昌的小儿子；宋艳：蔡甸区文化馆非遗办公室主任）

我的“长征”

◇ 王木甫（口述） 严 濂（整理）

人物名片：王木甫，武汉天朗实业集团董事长、湖北省楚商联合会副会长、武汉市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市工商联常委、武汉孝感商会执行会长、武汉汉川商会会长，系武汉市政协委员。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今天（2021年10月22日），是长征胜利85周年纪念日。85年前，红军将士一往无前，以必胜的信念创造了气吞山河的奇迹。

在人生漫漫征途之上，毛泽东主席的这首《长征》也一直激励着我砥砺前行，从一无所有到创办天朗集团，经历了一场属于我自己的长征。

藏器于身

我的家，在湖北省汉川市南河乡栗山脚下。略懂诗书的叔父给我取名为木甫，希望我能长成一棵结实的大树，顶天立地，开枝散叶。

在叶集人民公社读初中时，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河中学。1975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叶集村务农。因为大家一致觉得我有文化、人品好，被推荐当了村里的农技员，后来又成为村里的会计和村办企业销售员。

我总觉得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因此在劳作之余，只要有空闲我就拼命读书。我家屋后有一座小山岗，那里环境清幽。我喜欢在那里读书和思考，累了就听听鸟语，

和草木聊聊天，那是艰苦岁月里我最大的享受。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77年，作为改革开放的前奏曲，国家恢复停止了十年的高考。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于是我开始争分夺秒地学习，每当夜深人静时，我还伏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时而思考，时而背书，时而解题。苦心人，天不负。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我考上了当时省城知名的本科院校——湖北财经学院，即后来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为四乡八邻艳羡的第一批天之骄子。

198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汉川县纺织品公司，成了端铁饭碗的国家公职人员。汉川县纺织品公司是国有公司，主要从事纺织品批零业务。我被分配到公司财务科后，主动向老职工请教、学习，把财务工作做得很出色。当得知公司的销售额下滑时，我主动向领导请缨去做业务员。

领导看着我，疑惑地问：“跑业务可不比坐办公室啊，很辛苦的。你这瘦弱的身子能吃得消吗？”我拍着胸脯说：“我不想年纪轻轻就待在办公室里，就是想锻炼锻炼自己，我不怕吃苦。”

公司领导见我有文化又肯吃苦，就派我去与当时的解放军后勤军需工厂3501、3503、3533等对接业务，先从这些厂里购买军绿、警蓝、豆绿涤棉面料，然后批发给汉川城乡的个体服装厂生产军干服、军警服。作为业务员，既要负责进货，还要负责销售，这可是特别磨人的活。

当时，仿军服系列很是流行，人们以穿仿军服为时尚。几年后，我就把手头的业务做得得心应手。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军干服、军警服渐渐没有了销售市场，散落在汉川城乡的个

体服装厂几乎全部进军汉正街，自己进行服装加工生产和销售。做得风生水起的业务，突然像断了链条的车轮停止转动，这让我一度感到惆怅和迷茫。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我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的决策，即离开汉川，到大武汉去打拼。

待时而动

1988年8月，正值酷暑时节，我从汉川来到汉口，进入武汉瓷器公司工作。公司地处车水马龙的民众乐园附近，这里的南洋商场远近闻名。来后不久，我清醒地意识到，这里将会是我人生的一个全新驿站。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由于多年与个体服装老板打交道的经历，我一直把经营服装生产和销售梦想深藏在心里。



创业时期的王木甫

上班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我意外发现南洋商场有一个橱窗展示的是已经过时的几件普通商品。橱窗不大，只有五六平方米。我记得当时的心情无异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感觉机会来了！这里地处商业繁华地段，又在民众乐园附近，每天人来客往，如果我租下来，肯定有好发展。而且它就在瓷器公司对面，也方便管理，不耽误上班。

于是我当机立断，决定租下这个橱窗。可事情并不像我预料的那么容易。区区五六平方米的橱窗，商场经理开出了每月3000元的价格，这在当时可谓天价，一个月的房租要超出一个公职人员一年的工资。还由于我是瓷器公司的职工，签合同也成了问题。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以妻子的名义和南洋商场签订了租赁合同。

五六平方米的橱窗被我视若珍宝，像打扮新娘子一样对其精心妆扮。装修后的橱窗焕然一新，成了这条商业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琢磨市场之后，我决定在摊位销售海滩休闲裤、风帆牌T恤、时尚西服等。因为价廉物美，引领潮流，所以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抢购热潮，这也让我在短期内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90年初，有了一定资本积累和经营能力后，我又想自己承包公司门面经营服装。当我向公司领导说出想法后，公司的附加条件是除每年上缴1.5万元管理费外，另外为公司安置8名职工就业。这对于白手起家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咬着牙关签下了合同，但当我冷静下来，仔细考虑将要面临的筹措启动资金，重新确立市场定位，8名员工的安置以及员工工资的标准、发放等一系列问题时，我觉得肩上的担子特别沉重。

1991年底，汉正街市场扩大规模，延

伸到大夹街，在两条街道间要打通一个叫流通巷的通道，而瓷器公司约350平方米的仓库就在这里，只存放着一些没用的破旧瓷器。我觉得这条街道打通后，如果把仓库改装成商铺，应该会供不应求。于是我找到公司领导提出要承包仓库，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用每年24万元的租金将这个长年闲置的旧仓库盘了下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有所改变。我就在想，如果继续以目前的方式承包经营，永远只能开一家店，可我的梦想却是开很多很多家店。那是1992年的春天，为了能甩开膀子大干，经过深思熟虑后，我毅然决然办理了停薪留职。可离开公司后，我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轻松。

为了开阔自己的视野，我先后去了广州、香港及新加坡、日本等地，不停地考察，学习别人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

“天朗”之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到武汉后，我的眼界和胸襟都更加广阔了，开始对未来的发展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一是将自己的经营转型升级，将门店式经营扩展成批发式经营；二是创建自己的主营产品；三是打造自己的商业品牌。我要在浩如烟海的商标之林中，树立自己的品牌。

以服装销售为基础，我扩展的第一个项目是经营皮鞋。当时，武汉及江浙一带的皮鞋生产厂家蜂起，生产规模和质量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销售渠道不畅通，市场经营良莠混杂，不仅正规皮鞋厂商的经营发展受阻，普通消费者也常常遭遇价格和质量上的欺蒙。综合分析了市场情况后，我决定做自己的男鞋品牌。

“时间就是金钱。”有了想法，我第二天就召集几名高管和技术人员开会，宣布了这一决定。

那是1997年3月的一个早晨，天空中淅淅沥沥下着雨，我穿着半浅雨靴准备去上班。这时，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幅美好的画面：在一个天朗气清的早晨，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穿着笔挺的西装向一栋写字楼走去，他行路如风，那乌黑锃亮的皮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让他显得气宇轩昂、魅力四射。我琢磨着：一年365天中，大部分时间是晴天，人们还是穿皮鞋的时间多。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好一个天朗气清！品牌的名字就叫天朗。”

就这样，1997年5月，武汉天朗鞋业皮具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了。

稻盛和夫说：“宏伟的事业，是靠实实在在的、微不足道的一步一步积累获得的。”公司成立后，我秉持这个信念，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扩展业务，壮大公司。一切手续完善之后，我将一批质量好、信誉高的皮鞋厂家聚在天朗旗下，产品贴上天朗的标签，借助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和优质的服务，把天朗品牌打造得别具一格。甚至有一些厂家主动找上门来，要求用天朗商标贴牌生产，天朗公司选择了几家技

术和设备均占优势的厂家加盟。这样一来，天朗公司对天朗品牌的产品在质量和信誉上得到了更有效的管控。

后来，以与“百事”合作为契机，我开始全方位多领域的开拓商业合作项目，先后引进了日本“暖恋”内衣系列、香港“卡玛”商务休闲服饰系列和“歌莉娅”女装系列等国际品牌。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和努力，在零售这条线上，我先后在汉口中山大道、汉正街、万松园路及武昌解放路等地开设了30多个专卖店，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获得年利润几百万元。至此，天朗商业也开始初具规模。

另辟蹊径

到了1999年，我已经有了了一定的资本积累，正好国家在这一年提出了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立足于国内市场，并作为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在这种良好的营商环境下，我开始着手向实业经营方面发展。



1999年天朗鞋业商场新增柜台留念（右一，王木甫）

我想，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天朗鞋业正在稳步发展，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能开一家酒店，让江城人民和来武汉的人住得舒服，品尝武汉的特色美食，那该多么美好！

经过一番运作，我和亲戚在唐家墩租了一个闲置的商场开酒店。装修一新后，“天朗大酒店”于1999年12月20日正式营业。我们特意把酒店开业的日子选在澳门回归这一天，是希望我们的酒店能像祖国一样繁荣昌盛，在众多酒店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事与愿违，酒店的经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本来，酒店地段好，租金也不高，盈利应该是十拿九稳的。可是，由



武汉汉川商会会长王木甫

于我对酒店经营经验不足，又加上精力有限疏于管理，结果不到一年，酒店出现较大亏损。就在我准备加强管理力度时，2003年初，“非典”波及全国，这无异于给病人膏肓的酒店又打了一记重拳，酒店终于倒下了。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那时，虽然天朗酒店被迫停业，但天朗鞋业皮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服装销售代理做得顺风顺水、有声有色。就在这个时候，江汉区打造的万松园路国际品牌商业街即将开业，因为天朗鞋业是品牌服装销售代理公司，万松园国际品牌管理委员会把天朗鞋业作为重点企业，把我们的门店安排在了湖北省委党校大门左侧的一栋两层楼经营品牌服装。

由于生意的关系，我经常去上海淮海路考察。我发现巴黎春天商场有一家咖啡厅，当人们在商场逛累了的时候，常常去咖啡厅喝点饮品，吃点零食。有一次，我也进咖啡厅坐了坐，发现客人还不少。我突发奇想，我们天朗能不能也开设这样的咖啡厅呢？

万松园国际品牌商业街和上海的淮海路基本相似，每天来这里逛街的人络绎不绝，每年全省各地来这里学习的人不计其数，商务接待应该大有市场。如果一楼代售品牌服饰，二楼开个咖啡厅，应该会有较大收益。为此，我再次去上海淮海路，对大大小小的咖啡厅进行考察。

从上海回来后，我迅速找设计师设计装修风格，大到整体风格，小到窗帘、灯饰，我都要亲自过问。经过一番装修、打造后，具有欧式风格的“天朗咖啡”开业了。吸取了天朗酒店惨败的教训，这次我特别注重酒店管理，在市场定位、运营成本和服务质量等方面都进行严格把控。

“天朗咖啡”试营业的效果和业绩，

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随后，经过多方考察和洽谈，我又在汉口火车站和新华路投资开设了两家“天朗咖啡”连锁店，经营规模和项目都有所扩展，效益则成几何级数递增。

同时，我将“天朗咖啡”注册为国家保护商标，2003年底，公司又投资3000万元注册成立了“武汉天朗时尚休闲有限公司”，以经营西餐、经典中餐、咖啡茶语、时尚休闲等为主题。至此，天朗公司在武汉商界占据了一席之地。

2013年8月，我以3000万元注册资金组建了武汉天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营时尚餐饮、品牌服装销售、英语培训、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等业务。

公司成立后，我把“走进天朗门，就是一家人”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始终坚持“把客户当家人、把员工当家人、把顾客当家人”的理念经营公司。当你走进天朗集团公司总部，一进门就可以看见一张白底黑字的牌匾“走进天朗门，就是一家人”挂在墙壁上，我觉得这样的句子能暖人心。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天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成为一家多元化、复合型企业集团，拥有了天朗鞋业、天朗咖啡、天朗地产、天朗教育以及勃维投资、品圣物资、博马达贸易等子公司，主营产品服装代理销售、时尚餐饮服务、文化教育、商业地产开发等，公司正处在稳步发展和不断扩大的上升期。

赤子之心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故乡是一个人的根。

从2000年开始，我一直在关注家乡建设，资助家乡。2000年，村级电网改造，我捐款10万；2002年，我为村里保护文化遗产捐助8万；2007年，村里修公路，我捐献10万；2009年，村里引进自来水，我捐款5万——还有家乡的教育、医疗等方面，只要有需求，我都会资助。这些年，我为南河乡教育基金会、南河乡初级中学、汉川市慈善总会累计捐款近20万元。

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2013年，我成立了武汉市天朗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起回报社会、建设家乡的责任。公司利用破旧的汉川制丝厂厂房，与制丝厂所在的马口镇相关单位合作实施新农村建设。该项目投资一亿元，目前开发完成了“天朗花园”商住小区项目，面积达43000平方米。该小区不仅为当地居民改善了居住环境，更为城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王木甫委员工作室

2014年，公司为武汉市聋哑学校捐款5万元。从公司成立之初到2019年底，为武汉各界共捐款200多万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说过：“一个人只有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有所成就，彰显价值。”我觉得，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因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我在担任天朗实业集团董事长的时候，还担任着湖北省楚商联合会副会长、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市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市工商联常委、武汉汉川商会会长等多种职务。

作为武汉市政协委员，我努力践行“为国履职，为民建言”的职责。我尽自己所能，走访群众，关心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反映问题，而且把自己听到的、发现的有关问题及时反映给相关部门，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由于参政议政积极，我连续三年被评为“武汉市优秀政协委员”。

经过深入调研，广泛求证，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我提出了《关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建议》《关于江汉路步行街改造提档升级的建议》《关于延伸轨道交通线至汉川，拓展武汉向西发展空间的建议》等提案，并坚持会后认真协助做好有关工作，确保提案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收到实效。

作为武汉汉川商会会长，我努力把汉川商会打造成外地、汉川商人的桥头堡，商会成为连接外地、武汉、汉川各地的纽带。我带领商会同仁们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扶危济困，同时通过举办新春茶会等活动，竭尽全力为各分会和商家牵线搭桥、排忧解难。从2015年4月成立至今，我连任会长，短短几年时间，发展会员400多个，吸纳企业110家。武汉汉川商会为武汉、汉川两地

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连续三年被评为“四好商会”。

从栗山脚下走到武汉，从一无所有到创办天朗集团，我觉得一个人要能守其初心，始终不变。

我有两大爱好，一是喜欢看书。一个人只有不停地学习，才能不断进步，一个企业也只有不断向别人学习才能做强做大，立于不败之地。另一个爱好是拉胡琴。在家里，我有一把跟了我好多年的胡琴，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周末的时候，我喜欢拉几曲，调节一下。每逢这时，妻子还会在旁边唱几句助助兴。

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我始终觉得要想把一件事做成，第一是勤劳，第二是做好人、结善缘。而做好人、结善缘最重要的是真诚。是勤劳让我打下了江山，是真诚让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和员工的信赖。一个人如果能坚守这两点，做任何事都可以成功。

（严濂：《武汉文史资料》编辑）

转型年代的创业奋进

◇ 吴华林（口述） 李星（整理）

人物名片：吴华林，艾芙基（RFG）集团董事长、湖北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省楚商联合会副会长、武汉宜都商会会长、泰国青年华人商会副会长。

今年10月20日，母校湖北中医药大学举办了一场创新创业大讲堂，面对数百名师弟师妹，我做了一场演讲。我在演讲中提出，创新和创业是应对时代危机的主要纾困方式之一，同学们要有信心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其实，放在这里，也挺适合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因为，我的创业正是在这样一个激荡年代之中走出来的。作为第一批80后，我所出生的那个年代，整个国家尚处于转型发展初期，而我的家庭位于湖北宜都的一个小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更是远低于“平均线”。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只有拼，才有赢的可能！”

我很认同格拉德威尔的“一万小时定律”。他在《异类》一书中提出，经过一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大师的必要条件。我也是践行着这个“真理”，一步步从小山村走进大学校园，又走向社会舞台的“聚光灯”下。

医疗健康，事业的起点

说到成长经历，不得不提湖北中医药大学，因为这里是我人生的起点站。2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所坐落于昙华林街区的学校，此后四年，这里就成为我在武汉的第一个“家”。这里不仅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外面的世界”，更让我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

因为专业背景，医疗健康是我事业的起点。2002年初入职场，我就遭遇了第一个较大的挑战。当时服务的医药集团面向全国400多名员工征召开拓地市级市场的负责

人，时逢非典疫情，无人敢接。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我撕下“榜单”，在疫情最“猖狂”的时候，只身前往这个地处鄂西北的小城镇——十堰。几个月后，该区域的销售额从零飞升至六位数，我也顺理成章成为集团史上最年轻的高管团队成员。

创新大胆、敢想敢干，这些特质一直伴随着我，尤其在创业的道路上，更是赋予了我不少能量和惊喜。很快，这家企业已经装不下我的梦想，2008年我毅然下海。就在这一年，因为从事海外医疗中介的关系，我接触到了辅助生殖这个行业，那也是第一次意识到中国的不孕不育发病率如此高，让我“相当震惊”。辅助生殖，俗称试管婴儿，这个类别的医疗在当年还属冷门，但我已经意识到这个细分市场的价值所在。

根据2012年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的不孕不育发病率在12.5%—15%，患者人数超过4000万，这意味着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问题，理论上每年有200万—240万新生儿因为不孕不育无法出生。而且，随着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增大等，我国不孕夫妇人数还在呈上升趋势。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准备尝试下这个新行业。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经过几年的沉淀和准备，2015年我站上了风口。这一年，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逐步改变，“单独二胎”“全面二胎”“开放三孩”鼓励生育政策陆续出台。当年，我在柬埔寨投资建立的海外生殖医院开门营业。

有了政策红利，再加上前期积累来自行业技术、市场需求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大量经验，很快我又在海外投资成立多家海外医院（RFG医院），全力开拓境外业务。带着国内资深医疗专家团队，再配以采自世界

各地的先进医疗设备，RFG海外医疗品牌很快站稳脚跟，成为东南亚地区知名的中方投资机构。35岁那年，我以优秀华人企业家的身份受到泰国公主诗琳缇的亲切接见。

2019年秋，我带队前往世界顶尖医学府——哈佛医学院交流考察，先后参观探访了哈佛医学院辅助生殖中心波士顿IVF中心、贝斯以色列医院IVF中心等，双方签署了初步合作协议，指定我方作为哈佛医生集团中国区咨询机构。与此同时，国内两家门诊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中。

回馈社会，彰显人生价值

当一切都在朝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来了，快速前进的“高速列车”被瞬间按下了暂停键。因之前“见识”过非典，所以一开始，我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最多两三个月”。但随着朋友圈和媒体信息的激增，我意识到这次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大年三十晚上，我的朋友圈就“炸”了，一边是医疗圈的信息“缺！缺！缺！”一边是海外华侨圈的朋友们“捐！捐！捐！”而我则开始迅速收集各类信息，同时紧急联系各渠道的海外朋友们，包括我海外企业的中外籍员工们，安排他们紧急采购防疫物资，对接国内防疫机构。

曾有一段时间，泰国整个素万纳普的机场上堆积的都是我们采购的物资，等待入境。记忆犹新的是，当时不仅是我们自己的朋友，所有遇见我们的路人都会主动上前来打招呼，询问能做点什么。

等待过境货物很多因手续问题一直积压在机场，在机场等待登记的导游和大批游客主动上前，申请帮忙带货，一盒盒口罩、

一箱箱防护服很快“化整为零”，登上飞机。记得当时东航的机务人员发来照片，整个机舱内都堆着我们的防疫物资。

忘不了南京东方国旅领队庄红梅，忘不了徐州海关驻机场监管科副科长李凯，忘不了春秋航司 C6206 航班的全体乘务人员，忘不了连夜奔赴武汉送货的徐州邮政专车徐师傅……还有 329 名志愿者募集的 50 万元善款，以及四批次医疗防护物资。

收集整理发布信息的、集资募捐组织登记的、采购办理手续的；从物资原产地到航空航运，到海关出入境，再到货车搬运，最后直达医院隔离区……在那几个月里，我的海外华侨朋友们，楚商联合会、武汉宜昌商会的会员们，见过面的和没见面过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那段时间，我虽然无法出门，但每天通过电话、微信、网络，接力传递爱心，将救援互助的网络延伸到东南亚及国内的多个城市。我和团队组织完成捐赠总价值 300 余万元的医疗物资，个人捐赠现金近 20 万元。

2020 年末，我在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访谈节目时，回忆起了那段时光。在那次访谈中，央视主持人说，对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来说，社会责任和价值使命应该是坚守的底线。我十分同意这个观点，也是这样做的。这也许就是平日里常听到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吧。

助学，是我多年来坚持在做的一件事。我很清楚贫困生那种过早体会到社会残酷却又无能为力的感受，现在自己有了能力，就愿意多帮助一些贫困的孩子。如今，家乡宜都、武汉新洲、黄冈麻城、恩施来凤等地



吴华林向湖北中医药大学捐款 100 万元成立助学金

都有了我的“亲人”。2018 年，我给母校湖北中医药大学捐款 100 万成立“阳光励志助学基金”；2020 年，携手武汉宜都商会爱心企业家捐款 130 万元，成立“武汉宜都商会助学金”。

助学之外，我也不不断加强自己的能力提升，继武汉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又进入中国顶级商学院——中欧商学院进修。同年，还顺利考入了中南大学，研读博士学位，再次以学生的身份回到了学校。这将成为我人生又一个新的起点。

跨界转型，探索文旅新产业

都说，新冠肺炎疫情压垮了几大行业：一是跨境，二是旅游。不巧，我目前的事业版图几乎都在“射程”范围内！坦率地讲，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我的很多同行生存得很难，有的已经是“全军覆没”。当许多企业在业务萎缩、裁员降薪的时候，我们企业不仅没有裁员没有降薪，还坚持拓展跨境留学业务。

在经营东南亚市场多年后，2009 年我

们接触到了泰国排名第一的私立高校兰实大学。在几轮沟通后，基于双方事业发展的需求，我们决定进行跨境留学合作，在中国大陆区域开展“1+3”中泰本科项目。经过长达半年的市场调研，我们这个项目的第一站选择武汉工程大学，于2020年秋季顺利开班，到目前为止已招收学生超过100人。

进入文旅行业，更是有一个长期思考的过程。自2008年，我就已经开始协助客户出国接受医疗服务。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点点熟悉了出境业务，从办证到地接再到回国，自己都亲身经历过。尤其是最近三年，我的许多客户都是选择湖北省中青旅作为自己的旅游服务机构，因此我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了这家有着36年历史的老牌旅游企业。

和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在互联网冲击市场的浪潮中，旅行社的传统商业模式已显疲态，新冠肺炎疫情更使得整个旅游业雪上加霜。在过去的这两年间，许多旅行社陆续停业甚至关门。但危机，又何尝不是商机？经过团队反复讨论和市场考察，我们决定在这个行业最低谷时期切入进来。

2020年8月2日，湖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长江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艾芙基（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三方通过公开市场挂牌方式，共同成为企业持股方，分别占股10%、35%、55%。自此，湖北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正式开启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新篇章。

2021年11月8日，湖北省中国青年旅行社京山分公司正式成立，这是在接手湖北省中青旅之后，我们投资成立的第二家直营分公司。省中青旅第一家分公司在我的老家宜昌。根据规划，湖北省中青旅将以京山地区农业生态为品牌、乡村振兴为抓手，践行

社会担当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充分发挥省中青旅国企品牌优势和龙头引领作用。

以京山分公司为载体，充分发挥省中青旅消费帮扶+土特产销售、农业托管服务、景区开发托管、酒店品牌加盟和旅游车队资源的整合效应，积极开发当地旅游精品线路产品，提升当地旅游品牌，加快京山文旅产业发展，带动当地的扶贫增收，共同富裕。分公司成立当天，我就率队来到京山市马岭村，考察这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并现场达成初步合作协议。

旅游酒店不分家，省中青旅第一家直营酒店也已于今年的10月份正式启动了。联合上市公司正通集团，挂牌知名连锁酒店品牌秋果集团，第一家“中青秋果”酒店计划在12月开门营业。大文旅产业，互联网+酒店、医疗、教育、体育，线上平台，企业资源，再加上即将启动的康养产业，将带领湖北省中青旅走向一个崭新的未来。

跨行转型，是我事业上的一次重大挑战，更是我个人成长经历上的深刻磨炼。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经济的衰退，但危与机并存，对于有实力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这也是修炼内功的好时机。在一些同行“风雨飘摇”之际，我的企业实现全面转型升级。如果说第一个十年，我的创业赢在胆量与运气；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个十年里，我将以更大的努力与智慧，立足创新、与时俱进。

（李星：湖北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策划部员工）

为生者权为死者言

◇ 韩煦（口述） 白爱萍（整理）

我叫韩煦，现任职于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是武汉市最年轻的基层女法医。

从警六年来，我走遍了洪山区各个角落，参与勘查现场 600 余次，尸体检验 600 余次，提取有效生物检材 2000 余份，制作案件材料 100 余份，利用技术手段揭露犯罪嫌疑人 20 余次。我先后荣获“全国公安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武汉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汉警楷模”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 1 次。

一

1989 年，我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我的父亲是一名警察，因此打小我就有一个警察梦，对那身藏蓝警服有着特殊的情怀。高考结束填写志愿时，我发现警校和军校对女生的要求，无论是文化课还是身体素质都很高。我没能考上警校和军校，转而选择了医学院。

2013 年 6 月，我从天津中医药大学毕业，实习成绩优秀，准备和天津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签约。这时我偶然看到了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招生简章，顿时感觉自己心底的小火苗燃烧起来。晚上临睡前，我一遍遍幻想自己穿上警服的样子，想象着自己像电视剧《鉴证实录》的女法医一样，冷静、独立，抽丝剥茧、搜集证据，为逝者伸冤，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和家人商议后，我果断放弃了签约医院，决然地报考了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法医专业。

2015 年，临近毕业的我，又面临了一个人生的岔路口。虽然父母不说，但我看得出来，父母希望唯一的女儿留在身边。在众多招聘单位中，我最终选择了武汉市公安局，我看到了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体会到了武汉市公安局对人才的重视。就这样，曾经胆小得夜晚上厕所要将所有灯都打开的我，从中国的最北边，来到了距离家乡近三千公里的武汉，成为了一名法医。

二

真正成为基层法医后，我发现工作与自己原先想象的并不一样，并没有那么多大

案要案，更多的是一些非正常死亡的现场，比如意外、自杀、因病去世等。刚开始时，我有点失落，感觉没有那么多谜团等待自己去解开，一腔抱负得不到实现。但慢慢地发现，这些看似简单的现场也同样是考验，每个生命的逝去，对死者的家庭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知晓真相，是生者活下去的勇气。法医对死亡原因的详细解释，能让死者家属更容易接受事实，减轻他们的悲痛。我对自己说，每一次勘查都要认真细致谨慎、竭尽全力，为生者权为死者言是自己从业的初心，也是沉甸甸的责任。

我清晰地记得自己从警后的几个“第一次”。

第一次值夜班出现场。那是2015年11月的一天，下雨。临近转钟时，警情传来：一名男子在遛狗时与他人发生争吵被捅死。洪山区公安局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我作为法医和同事们赶往现场。一路上我不停地想着取证的诸多流程，可到了现场突然紧张起来，室外比室内提取证据的难度大多了。现场位于城中村，男子死于私房外，嫌犯持凶器还没有跑远，在雨水不断地冲刷下，血迹被稀释，我必须尽快提取到有价值的证据……夜凉如水，我和同事们冻得直哆嗦，但我们咬牙坚持着。一个小时后，我在地上、墙壁、扫帚等位置提取到了4处血迹。根据血迹的形状，我判断出嫌犯逃跑的方向，最终帮助同事锁定了嫌犯。早上8点多，凶手落网。

第一次出现场勘验腐尸。2015年底，洪山某公寓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已高度腐烂，面目全非，臭味难闻，现场到处都是臭水，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胃里翻江倒海，强忍着呕吐进行勘验。初步勘查发现，死者是一名中年男子，因生活潦倒、身体虚弱而

去世，由于无人发现，已去世多日。对于刑警们的判定，死者家属并不认同，表示一定要“查出”真相。于是，在家属的同意下，我上阵解剖尸体。解剖后，我有了结论，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我将检测结果一点一点地讲解给家属听，家属终于认同了结论。

三

同事们都说我爱“较真”。

2016年初，我接到洪山交警大队一起交通事故的求援信息：犯罪嫌疑人肇事逃逸，被害人已经死亡，嫌疑车辆两天后被追回，但嫌疑人拒不承认驾驶该车时有肇事行为。出现场那天，气温骤降，天空中飘着雨，我和同事一行三人围着肇事车辆勘查了足足两小时，不放弃蛛丝马迹。终于，我们在前挡风玻璃边框和雨刷器的夹缝里，找到了几片不足米粒大小的皮屑。后经DNA比对，嫌疑车辆上脱落细胞的STR分型和被害人的一致，犯罪嫌疑人最终在证据面前认罪服法。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为自己能替逝者洗清冤屈而感到自豪。

同年9月，发生了相似的案情，但这次嫌疑人肇事后，将嫌疑车辆送到汽修厂进行了维修和清洗，这对提取物证很不利。我根据交警大队民警提供的线索，模拟当时撞击的场景，判断可能留下物证的位置，经过仔细勘查，最终在副驾驶座位下找到数根毛发。经过比对，嫌疑人的肇事逃逸行为得以证实，为受害者讨回了公道。

只有“较真”，才能让狡猾的嫌犯“无所遁形”。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接到警情，一男子说他家隔壁有一名独居女性在家中死亡。我和同事们立即赶到现场，发现该女性

已经死亡三四天，尸体高度腐败，现场还有大量的蛆虫。

我对现场进行仔细勘查，并没有发现特别异常之处。屋内物品的摆放比较整洁，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门窗完好，没有撬压和暴力进入的痕迹。一切看似正常，但我还是发现了若干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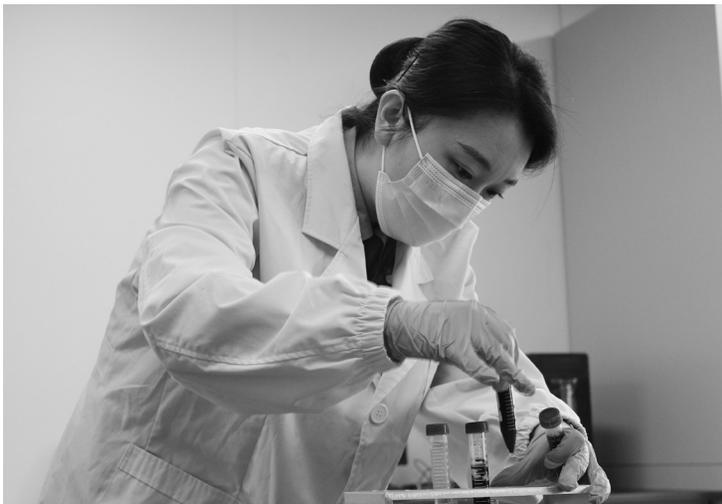
进一步走访调查得知，距离死者死亡时间不久，有一名可疑的男性曾来到死者家里，并且逗留了较长的时间。死者体表没有明显的损伤，我排除了毒杀的可能性，判断死者极有可能是机械性窒息死亡。顺着这个思路，我对尸体进行了细致解剖，几个小时后，最终在很不起眼处发现死者死于机械性窒息的证据，帮助同事一举抓获了嫌犯。经过审讯后我得知，嫌犯当时在现场进行了彻底清理还原，甚至销毁更换了沾有死者呕吐物的床单。

我认为“较真”就是对生者最大的慰藉，对死者最大的尊重。

四

现实的法医工作比影视剧里展示的辛苦得多，我总是工作在别人避之不及的殡仪馆、解剖室，经常面对血腥、恶臭和蛆虫。六年来，我全天候24小时待命，看过武汉每个时段的天空，严寒酷暑、披星戴月，我记不清多少次被树枝割伤过手，多少次在野外被蚊虫蛰伤过脚。

作为一个北方姑娘，我对武汉夏季的“水深火热”刻骨铭心。因为温度太高，在夏季非正常死亡现场，我经常碰到腐败尸体，臭气熏天、蛆虫满目对我来说已经习以



法医韩煦在实验室化验

为常，厚厚的隔离服和防毒面罩让我汗如雨下。武汉夏天的雨水也很多，因为要带装备勘查现场，民警们没办法撑伞，冒雨工作便成为家常便饭。夏天出勘现场，这身警服就没怎么干过，要么被汗水浸湿，要么被雨水浸湿。

法医这个职业有时也会遭遇危险。有些尸体有严重的传染疾病，我在尸体检验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走访调查才得知，虽然有防护装备，但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仍然让我有很高的感染风险。一些现场的地理环境恶劣，有时候尸体所处的位置很难让人靠近，有摇摇欲坠的高台边，有人迹罕至的野外。但无论现场条件如何，我必须对尸体进行全面检查，要判断死亡时间，还要观察死者的姿势，检查随身物品，以及是否有明显的损伤。有些尸体非常重，需要两三个人才能翻动，每次解剖尸体，几个法医一起操作至少也要两三个小时。如果遇到一些损伤严重或者不完整的尸体，检验的时间会更长。

虽然法医这个工作苦、脏、累，有时候也面临很多危险，但每当案件告破、逝者瞑目时，我觉得经受再多的苦与累都是值得的。

五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当时正值春节，我本打算回老家探望年迈的父母，但疫情当前，我果断退掉机票，加入了抗疫大军。

作为一名法医，我免不了要接触尸体，但是在疫情期间与尸体打交道，长时间、零距离接触死者的呼吸器官和体液，无疑大大增加被感染的风险。但我没有畏惧，严格遵循现场处置流程，先后参与尸体检验百余次，现场勘查200余次，提取有效生物检材400余份，利用技术手段比中犯罪嫌疑人10余次。

2020年3月的一个深夜，洪山区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一女子在家中死亡，有大量财物丢失。现场打斗痕迹明显，血迹等物证被清理过，没有目击者，嫌犯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如此棘手的案件容不得半点耽误，必须迅速掌握线索，锁定嫌疑人。我从到达现场勘查开始，就始终穿着两层防护服，防护服的密闭性很好，加上尸体解剖工作要求精神高度集中，不一会儿防护服里潮湿闷热的空气就让我觉得缺氧、体力不支。

那天，我一口气工作了整整14个小时，高标准地完成了解剖，这期间我没有喝水吃饭和上厕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找到线索，锁定真凶！结束工作后，我近乎虚脱，还没来得及脱下防护服，就坐在殡仪馆解剖室的门口睡着了，只模糊地记得同事往我身上一遍遍喷洒酒精。最终，我通过认真细致地勘查和检验，不仅查出被害人死亡的原因，还提取到了关键物证，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线索。距案发的第16个小时，狡猾的嫌疑人被抓捕归案。

疫情期间，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每次出警，做好勘查工作的同时，我和同事们还需要帮助家属进行环境消毒，遗体转运，联系民政部门等，处理一个现场至少需要三四个小时。一次次与病毒擦肩而过，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被感染，可每当看到逝去的生命和无助的家属，我总想为他们、为这座城市多做一些事情。

武汉解封重启的那天，几位从事防疫工作的退伍军人找到我，说：“虽然一直没有看到过你的样子，但听声音就知道是你。因为每次现场只有你一个女同志，一起拼命了70多天，我们也算是战友了。”说完立正站好，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一刻，我眼泪奔涌。

2020年9月，我获评“全国公安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六

经常有人问我：“法医工作那么苦，你一个女同志是怎么坚持下去的？你这么累到底为了什么？”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法医工作是整个刑侦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从未后悔过选择法医这个职业。每一个案件的侦破都缘于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我非常幸运能够成为2万汉警当中的一员。

还原每起案件、为死者伸张正义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将不辜负新时代的青春韶华，不辜负身上穿着的藏蓝警服，用我一技之长，为打击违法犯罪贡献一份力量。

（韩煦：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女法医；白爱萍：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工运》编辑）

心中有梦，做公平正义的践行者

◇ 张霞（口述） 唐红漫（整理）

人物名片：张霞，武昌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湖北省社会与法治委副主任、湖北精以相天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湖北省律师协会建设工程房地产专业委员会执委。

法律是人类聪明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理性的极致表现，是现代文明的基石。“良法善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抓手和典型特征。但法治需要呐喊，需要践行。

我是张霞，一个心中有梦的法律人。

追逐梦想，从监理工程师到律师

说起律师，可能很多人眼前都会出现金丝眼镜、西装革履的社会精英形象，但我的律师之路其实是从建筑工地开始的。

大学我学习的是工民建专业，毕业后进入建筑行业，成为一名监理工程师，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办公大楼、湖北美术学院教学

大楼、水果湖欧式一条街等一批较大型项目的监理，其中一些项目被评为优良工程，此时的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小有名气了。

决定转行做律师，我考虑了很久。从事建筑行业近十年，我对工地、建筑有了很深的感情。年近三十的我已成家得子，养家糊口的压力和收入的稳定性不得不纳入到自己的考虑范围内。在大多数人看来继续做工程师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但我最终还是没能按捺住成为一个“法律人”的梦想。

记得那一年，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位农民工为讨薪，顶着凛冽寒风爬到高高的塔吊上，不管不顾地诉说自己苦苦工作一年，到头来领不到一分薪水的酸楚。他绝望地感叹对不起老婆孩子，没脸回家，不想活了。我十分气愤，恨不能冲到电视里帮他把应得的薪水讨要回来。平常总泡在工地，对农民工群体特别熟悉，对他们吃的苦、受的累我感同身受，加上20世纪90年代建筑市场秩序远不如今天这么公开透明，沙石霸、黑恶势力在工地横行，强买强卖的现象时有耳闻。

我心中燃起熊熊的正义之火，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农民工群体争取劳动所得，改变建筑市场无序现状。然而要想实现这一梦想，身为监理工程师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成为一名律师，才更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影响到更广的领域。

从一个灰头土脸跑工地的工科男，转变成一名律师，这比我想象中要艰难……成为律师的第一道门槛，就是要通过“天下第一考”——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和我同台比拼的是成千上万名法学学士、硕士、博士，而我是理工科出身，平时更多与数字、公式、图纸打交道，未曾接触过法律专业，连宪法、刑法和民法最基本的概念都不清楚。而要学习的法律书籍有上百万字，厚得像板砖，逐字逐句读一遍都很困难，更别提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

当时我还得天天跑工地，没有专门的时间用来复习，只能利用每天在通勤车上的两三个小时来啃法律条款。早晚高峰时段车上人挤人，不方便捧着整本书背，我就把书拆开，每天带二十页在身上。就这样，我一天天、一页页慢慢啃完了整本教材，以高分成绩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进入律所，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

走专业路，从小律师到大律师

怀着满满的激情踏上律师路，而生活很快给了我当头一棒。初入律师行业的我既无案源，又无人脉，收入的骤减让我面临生存危机。

失去监理工程师的稳定收入来源，我别无选择，只有从最小的案子做起。调查取证、看守所会见，我对每个案件事实深入调查，对每一份法律文书精益求精，对每一次

开庭认真准备，尽可能用最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客户争取权益，赢得客户信任。上海、山西、山东……全国各地都留下了我匆匆的身影：为一个国有企业维权，去上海开庭20余次；在青岛开庭碰到突发的寒暴天气，差点就不能回来；办理有些案件甚至还需要面对涉黑人员……记得最多的一次我同时接了三十多件案子，就像是进行一场“极限运动”。

困难面前，我想过放弃、想过退缩，但那段时间经手的一例校园人身伤害案让我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坚定了自己的执业决心。一名小学生在学校体育课结束后，因为调皮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肾脏破裂，小孩家长把学校告上法庭。从同情弱者的角度讲，大部分社会舆论站在小孩一方，但作为学校方的代理人，我必须维护学校的权利。通过研究，从法律角度理性分析，学校不应承担监护责任而只应承担过错责任，学校在这件事上没有过错，就不应该承担责任。遗憾的是，最终法庭还是判学校承担20%的责任。

如此不依法判决的后果，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判决带来不良影响。当年就有很多学校取消了春、秋游，甚至不再组织体育活动。一次看似维护弱者权益的判决，实际上却影响了整个青少年群体的健康成长，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个案子对我冲击很大，让我更加明白维护法治不应仅停留在表面公平，更需要思考其内在的合理性。

在日复一日的小案子中，我深感自己工作的被动性和局限性，通过深入思考判断，我认识到专业化才是律师行业的发展方向。之前，我以为做律师就是“打官司”，但当我走上专业这条路后，非诉讼领域就向我敞开了大门。

1999年，我担任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法律顾问，这是当年武汉市重点工程，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很重视。整个项目大如土建、桩基，小如空调、电梯，涉及大大小小的工程合同400多个，其中有许多需要通过诉讼或者仲裁解决纠纷。比如会展中心42部扶梯投入使用后，供货方被告上了被告席。这个案子普遍被认为“不好打”，一是扶梯已经投入使用，不好区分是质量品控问题，还是使用不当产生的问题；二是扶梯的供应商是全国知名品牌，如果没有扎实证据反映扶梯本身的问题，由厂商负责的代理意见大概率不会被采纳。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终于发现了纰漏：一份小小的配件清单。单子上明确写着扶梯的所有核心零部件都是进口的，但根据我在工地的经验，用这个报价不可能买到这些进口部件。我让客户将运行中的扶梯拆解一部，果然发现其中50%以上的部件都是国产替代的。于是，依靠这样的细节，我们最终得以胜诉。

还有一个案件，起诉金额接近4亿元，最后官司打下来法院认定的工程款仅4000多万元，仅这一个合同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亿多元。

走在专业化的道路上，我的视野豁然开朗。利用十多年的建设工程经验，我能够轻松看懂图纸与各种规范，毫无障碍地与当事人沟通交流——有时候，我甚至比当事人更专业。有一次我去上海中院开庭，开庭后法官问我：“张律师，你到底是工程师还是律师？”我骄傲地说，我既是工程师，也是律师。

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突破后，我终于赢得了更多客户的信任，渐渐有了一定的名气，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律师成长为武汉工程领域无人不晓的“大律师”。

服务社会，从九三社员到政协委员

本着做好一个法律人的初心，2007年，我担任了武汉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在任期间办理了一大批重大疑难案件。我所写的部分裁决书还被评为优秀裁决书，期望以公平公正的裁决，助推法律公平。

我40岁那年，申请加入了九三学社，积极参与到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工作中。

我对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和基层自治等比较感兴趣，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调查研究、撰写提案，建言提升社会组织的活力和基层社区的自治效率及水平。当时全国都在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城镇化后基层治理能力堪忧。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也在关注如何利用社会组织和基层社区去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我凭借这方面的成果在九三学社全国论坛上作了大会发言。



张霞在中信泰富大厦“法律大讲堂”演讲

很快，我当选为政协武昌区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能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能力，“参政议政、双岗建功”。

在政协委员这个新岗位上，我更加努力学习，通过集体提案和个人提案，完成了《完善信访工作的建议》《完善诉前财产保全的建议》《推进和完善社区民主自治》等调研报告和提案。2017年，我当选为九三学社湖北省第七届委员会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为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通过政协这个平台，我参加审议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可以更好地了解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措施，以及法院、检察院在司法过程中的成绩和不足。政府行政官员和法院的院长、检察长也通过倾听政协委员的意见，完善和改进相关政策法规。一次次互动中，我深刻体会到政协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自己有机会在社会法治的顶层设计中出谋划策而倍受鼓舞。

精以相天，从低端管理到科技赋能

政协工作给我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开阔了我的视野，也让我结识了更多优秀的同行。在我刚刚成为律师的时候，武汉律所实行的是“分摊制”，房租、水电费、行政人员的工资等等都会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许多年轻律师没有案源、没有底薪，生活窘迫。所以我一直都很想做一家年轻律师有底薪、有培训、有归属感的律师事务所。此外考虑到随着律师行业的发展，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完全依靠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能适应市场的，于是我想要组建一家“一体化”的律师事务所，加强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提升办理案件的质量，并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律师。

2019年，我带领自己的团队在武汉天地成立了一家“一体化、科技赋能”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精以相天律师事务所，力求以精益求精的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

在精以相天，每一位年轻律师都有相对优厚的底薪，不用承担高额的房租、水电费等律所开支。律所里还配备茶室、咖啡机一类的办公、生活设施，为律师们提供舒心的工作体验。把关案件质量，同时更多关注年轻律师的发展，让整个律所共同成长。

在信息化的时代，科技赋能法律服务是必不可少的。我关注到一款法律科技产品——阿尔法法律智能系统可以大大提升办案的效率，在创业初期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就给每一位律师都装备上了这款办公软件，实现案件可以作为项目统一管理，案卷档案信息等都能录入系统，智能证据系统提高了70%的阅卷效率。项目模板和法律法规检索对新律师非常友好，让他们能够很快上手办理案件。

成立律所刚刚半年，2020年初就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这给律所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其间，作为政协委员，我不仅下沉社区，积极投身抗疫，在律所歇业期间还坚持给律师发工资。武汉解封后，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复工复产，2020年取得了业绩翻番的好成绩。

未来，我希望能和我的团队一起，以“一体化和科技赋能”持续“精以相天”，让我们的律师事务所成长为中部地区的品牌强所，在推进中国法治化进程中贡献我们法律人的力量！

（唐红漫：九三学社社员）

在光影与建筑中寻找城市的无限可能

◇ 蔡新元（口述） 郭佩珊（整理）

人物名片：蔡新元，武汉市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光影交互服务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数字光影技术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动画、数字媒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入选中组部国家特聘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武汉3551人才。武汉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城市合伙人。

十年，放在历史的轴线中不过是一粒稍纵即逝的微尘。

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讲，可能刚刚只够做好一件事。

那么十年，对于一个学科意味着什么，对于一座城市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在学科建设领域，一门新学科立起来，一般需要20到30年；成长壮大，则需经过几代人的持续付出，才能得以稳定。而我创办华中科技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从无到有，从无人问津到一本选择率高达95%，正好用了十年时间。

这十年是学科发展的十年，也是学科成果转化运用的十年。自2012年武汉中心百货大楼数字光影首秀，我带领团队打造江城武汉最美夜色，先后完成“江汉路灯光秀”“国庆70周年‘光耀湖北’彩车”“黄鹤楼灯光秀”等多项重点文化与科技融合工程，助推建设武汉文旅城市新形象。

我是蔡新元。媒体人喜欢称我为“光影魔术师”，但我个人更偏好另外两个头衔：蔡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



2021年3月江汉路步行街樱花主题灯光秀

业创始人，光影交互服务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蔡委员——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城市合伙人。

十年磨一剑，学科创新打造全国一流专业

2010年，我从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ZKM）学成归来，进入华中科技大学任教。当时，我认定设计学的出路和方向，实际上并不取决于设计自身的主体性发展，而必须跟其他的学科交叉发展，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多新的东西。于是，我一直致力于探索设计学科中的全新领域，最后把方向确定在数字光影。

什么是数字光影？其实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是对在空间中使用光设备，创造新体验的创新技术与创意的总称。大家常说“就是个投影嘛，就是个灯光嘛”，但我们用学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数字媒体艺术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当时其他学校已在其中某些方向上有所建树，如果我们停留在向那些学校取经的话，就永远只能跟跑。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个领域成

为全国第一，与当初专业设置上的创新密不可分。

许多人羡慕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羡慕我们拿到的各种项目，羡慕我们获得的各种奖项，但是退回到十年前我们专业创建之初，才会发现我们的每一步都很艰辛，但每一步都很稳健。我们从一个学科方向变成一个专业，并逐步建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专业。

刚回来那两年，做数字光影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老师，只有一个学科方向，连正式专业都没有，没有学生，没有空间。每年6月是最紧张的日子，我们得跑到其他专业去动员，向学生推介我们的专业，游说他们来选择这个学科方向。

生源方面的被动，让我们决心去建设本科专业。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为数字媒体艺术申报本科专业，因为基础太弱，连续两次申报都失败，直到2015年第三次申报才成功，开始建立第一个本科专业。2016年正式招生，就在去年，送走了第一届毕业生。

这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好在华科大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氛围，很多人在支持我们，大家相互帮衬着，快速把学科拉升起来。

在华科大任教这些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学生对我们专业的热爱。男生和女生都在干同样的工作，该熬夜的时候大家奋战在一起，项目进行到关键阶段可能连续几天几夜不能好好休息。这对一个人的意志是非常大的挑战，但他们都能坚持下来，出色完成任务。

无论哪个学科，唯有热爱才能坚持，你没有办法靠一点点利益的诱惑，让学生在

某个领域持续地工作下去。非常幸运，我们能在华科大遇到这样一群学生，他们因为兴趣转化成一种热爱，升华成一种理想，进而把它当作自己的一种事业追求。所以，我们在教育学生的同时，学生也在塑造我们，师生之间的相互磨合，成就了我们的专业迅速发展的态势。

这十年来，在学校和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科研平台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1年建立新媒体艺术研究所，只是一个系级科研平台；2015年建设数字媒体艺术本科专业；2016年研究所升级为校级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2019年获批数字光影技术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今年，我们获批建设“光影交互服务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成为国家级的科研创新平台。

十年苦耕耘，爱与坚持创造武汉文旅奇迹

学术上的成绩，为学科应用创造了更多可能。在学科上站稳脚跟后，我就开始尝试用专业知识为社会做一点事，这一路的艰辛至今记忆犹新。

2013年1月6日，我们接到任务，要求在江汉关搞一场能代表武汉创新的灯光秀，元宵节当晚将有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市长来现场。时间特别紧，中间还跨着一个春节，最大困难是当时压根没人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们把好百年饭店和江汉路的出口连成一体，将整个江汉关大楼封成一个近7000平方米的“大屏幕”，动作非常大，事情非常新。新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几乎没有人赞成。除了组织运作上的困难，制作过程中的难度更是超出想象。我们整个系统都没有搭建起来，工作量巨大，时间又特别紧，只得决定所有人春节都不回家。偏偏春节下

了非常大的雪，所有餐馆关门，吃饭都成问题。从初一到初五5天时间，我岳母每天蒸一锅馒头送来，这就是所有人的饭。没有超市开门，我们自带咸菜、老干妈、方便面，一直撑到初六，有店家开门才吃上饭。

晚上睡觉，为节约成本，我们只在酒店包一间房，大家轮流洗澡。每个人买个睡袋，到最后大家累得连睡袋都懒得钻，倒头就睡，睡醒就接着工作。我两边跑，凌晨两点回办公室，还要去看方案制作的进度和精细程度，创意哪里还要调整修改……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打赢了一场硬仗，而且只用了23天。

我一直对我的学生强调，唯有热爱才能坚持，不能期望睡一觉起来就能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是否惊天动地留给别人去评价，只有自己才知道为了这一瞬间的绽放，付出了多少年的艰辛。

我们做过很多项目，做成之后报道和荣誉铺天盖地。谁可曾想到，这之前很长一



蔡新元（右三）与华科大数字光影团队在黄鹤楼灯光秀现场

段时间，大家都在揪头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停地在创意、制作、执行、修改，每一个环节都要检查到位，最后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满意的成果。

五年勤履职，建言打造“数字光影武汉”

2017年，因为在学科建设和社会服务方面取得的成绩，我被推荐为第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5年来，我一共提交11个建议案，集中体现三个主题：第一是“创新城市”，围绕如何建设“武汉世界设计之都”，执笔起草了申报书，最后形成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案；第二是武汉文旅夜游，以“长江灯光秀”为代表，江汉关、江汉路、长江大桥、黄鹤楼、昙华林都留有我们的痕迹，可以说在武汉已找不到我们没有做过的地标；第三是推进设计创新教育。

虽然看起来是三个主题，但实际上是一件事，即结合本职工作让创新赋能，用专业知识服务武汉城市发展。我也很关注医疗，但从来不做医疗的提案，因为我的专业度不够，一个人的专业认知、经历及对事物的洞察都是有限的。任何一个调研和提案，都源自你对专业的理解，否则你就没法当好“参谋”。

转过头再看，政协委员工作与学科建设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是专注，还有一个是创新。

现代社会的所有创新，往往集中在一个领域，在一个很小的方向上突破创新。夜间经济也是一样。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明确强调“大力发展夜间文旅经济”。《2021中国夜间经济最新发

展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夜间经济规模突破30万亿元，同比增长5%，预计2021年将增至36万亿元。我们所做的数字光影，实际上就是分享了夜间经济这块大蛋糕。所以，对学科要有前瞻性，要敢为人先，敢于创新。我们从事这个专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夜间经济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说这个概念，更没有人说文旅夜游，但我们预测这就是未来的样子。

未来一定是对现在的有序改变，它才有可能被预测。文旅也是这样，当日间市场趋于饱和的时候，它发展的下一个热点一定是在夜间，它在做存量市场，而不是在做增量市场。什么叫存量市场？就是说到了晚上其实人都在这儿，只是不出门了，整个行业就停滞了。那么，晚上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人出去？就是再造一个跟白天不一样的场景。黄鹤楼还是这个黄鹤楼，但是我们用灯光来装饰它，用表演来丰富它，这就是可被预测的未来，就是前瞻性。

担任政协委员这五年间，在我的建议和团队执行下，武汉在文旅夜游领域取得了质的提升。从2018年长江灯光秀开始到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武汉现象”，武汉在全国旅游城市的排名从第15名跃升为第7名，很多城市跑到武汉来学习取经。

回首这十年，不敢说取得多少成绩，成败功过总是需要留给后人评说才够客观、才有意义。让人欣慰的是，我能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教育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让数字光影技术被更多人触及，让城市因数字光影应用而更具魅力。

（郭佩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百湖一城半生缘 探得武汉“湖泊图”

◇ 陈红梅

客行江湖，人恋山水。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生活在这里的人分外依恋这里的地理风物，这一切铸就了他们的血肉和心灵，以至于化为生命基因，成为城市的灵魂。

在武汉的自然环境中，湖泊是最有特质的风物景观。武汉与水相生相伴，素有“江城”之称，又有“百湖之市”美誉。众多的湖泊，或云水相依，山湖相映，或碧波万顷，各具风情。如果说两江交汇、三镇鼎立彰显了江城的磅礴气势，那么百湖密布、水系纵横则赋予了武汉的秀美景致。拥有如此多穿城而过的湖泊，全国独有，世界也不多见。湖泊，是大自然对武汉人民的恩赐和馈赠！

湖泊作为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是武汉城市生命力的美好象征和城市形象的重要标志，目前这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但在

20年前，湖泊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人们对湖泊的认识是肤浅的。虽然我从小就生活在武汉，但在2000年前，对湖泊的了解较为肤浅。只是由于机缘巧合，才开始了对它的关注并产生情愫，继而引发了长达20年的研究和记录。

从2001年至今20年时间，我先后主编、出版了总计400万字的湖泊书籍《武汉湖泊》《水都武汉》《武汉湖泊志》，首创了多个全国第一。这些书籍不是一般意义上用手书写出来的文字，而是漫长岁月中踏访武汉三镇用脚丈量出来的心血汗水结晶。它不仅记录了武汉湖泊发展变迁史和保护规划的成就，同时也见证了我20年走近湖泊、了解湖泊、痴迷湖泊，进而挚爱上这座江湖城市的心路历程。

湖泊开启人生最美的际遇

读大学时，我邂逅了对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瓦尔登湖》。这是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独居家乡康城瓦尔登湖畔的记录，描绘了他两年多时间里湖边所见、所闻和所思，内容丰富，语言生动。从书中我了解到许多生物、地理和人文知识，但最打动我的是他以细腻笔触描绘出的湖泊形态、景致、风情等，让我由衷感叹：湖泊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能生活在这样的湖边是多么的诗意！

正是这本书刷新了我对湖泊的认知，激发起我对湖泊的探寻之心。虽然武汉有“百湖之市”美称，但武汉人能随口叫出湖泊名字的并不多。在许多市民印象中，只有东湖是大而美的。东湖地处武汉交通要道内环线和外环线之间，水域面积33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的6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中湖。但武汉人对其的了解并不是基于这些数字，而是一些吟诵东湖的诗词。

比如脍炙人口的朱德诗词“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还有东湖高8米、宽10米摩崖石刻上，南宋文人袁说友所作的《游武昌东湖》：“只说西湖在帝都，武昌新又说东湖。一围烟浪六十里，几队寒鸦千百雏。野木迢迢遮去雁，渔舟点点映飞鸟。如何不作钱塘景，要与江城作画图。”从这首诗看，东湖的人文

历史至少可前溯至南宋，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东湖发生的历史故事有着浓郁的楚文化色彩，最著名的是屈原行吟。屈原是湖北秭归人，由于经常给楚王提意见，先后两次遭到流放。据传，屈原在流放旅程中曾涉足东湖，体现在他的诗中：“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1979年，叶剑英元帅在视察东湖后题诗：“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表达了对屈原的崇高敬意。“行吟阁”就是为纪念这位以身殉国的爱国主义诗人而修建。如今，屈原成为东湖楚文化的灵魂。

东湖不仅有外在的风景美，而且蕴含了如此丰富的内涵，多么值得去挖掘和探索！从来没有一种风物让我如此着迷，湖泊成为我人生最美的际遇，开启了我追寻湖泊的序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满怀信心四处寻找湖泊的知识和信息。但很快，现实给我浇了一盆冷水：武汉到底有多少湖泊？都分布在哪里？其历史演变是怎样的？现状



陈红梅在卓尔书店作武汉水文化讲座

又如何？没有一本书做过详实记载，书店里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书。而从其时的媒体报道中，我了解到武汉湖泊整体现状不容乐观。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很多湖泊被污染和填占，救救湖泊的声音不时见诸报端！

失望的情绪中，一个大胆的念头冒出来：为什么不像《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一样，写一本关于武汉湖泊的书？这个富有挑战性的目标让我兴奋不已，他写的是一个湖泊，而我要写的是几十、上百个湖泊！想到就要行动，我立即着手了解武汉湖泊形成演变的历史。

追溯武汉湖泊的演变历史

武汉属于古云梦泽范围，由于地质结构变化，泽水面积缩小，陆地面积扩展，形成了一些构造湖、洼地湖和淤积湖，这就是武汉成为百湖之市的地质缘由。武汉湖泊的形成与河道的演化密不可分，与长江河道主流的摆动有极大的关系。长江河岸的摆动，带来武汉湖泊沿江分布的变化，并且以平原湖泊居多。汉江和其他支流的通过及改道，也很大程度上影响武汉湖泊的形成与分布。

三国时期，今武昌地区的东湖和沙湖自然相连并直接与长江相通，另通过水道与南湖相连。南湖也是通江湖泊，在沙湖和南湖之间有一个小湖时称东湖。严东湖、严西湖、北湖自然相连，并直接与长江相通。现今汉阳、汉口地区，由于汉水入江口尚未稳定，汉阳和汉口尚无明显区分。直到唐宋时期，长江、汉水及江湖关系、湖泊演化都未发生明显变化。

明清至民国时期，武汉城区湖泊发生较大演化。以前系荒洲洪泛区的汉口，明清时期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湖泊以后

湖和东西湖为主。汉阳的湖泊与长江、汉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改变，墨水湖不再是汉水入江通道，与长江的直接联系也因为沙洲的出现而中断。汉阳的湖泊因来水变化及淤积而变小，出现月湖等河流遗迹湖。武昌的湖泊也发生许多变化，南湖因沙洲发育不再直接与长江相通，东沙湖水系入江口也由武泰闸控制。南湖与东沙湖水系的联系通道不复存在。

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武汉城区内很多湖泊被填占湮没。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围垦，导致湖泊面积大幅度缩小，城区湖泊水面减少近60%。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城市建设发展高峰的到来，使得湖泊面积再一次大幅度缩小，一些湖泊不复存在。同时，城市规模扩张又是湖泊水系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导致部分湖泊、水系连通廊道消失。

1991—2002年，武汉主城区的湖泊水域变化十分明显。1991年主城区湖泊面积约为151km²，至2002年缩减为113km²。汉口的湖泊面积最小，不及汉阳的1/4，武昌的1/10，但汉口湖泊面积缩减最多，约为29%，武昌湖泊面积减少约18%，汉阳湖泊面积减少幅度最小。汉口湖泊水域消失的部分，主要分布在后湖乡、姑嫂树、塔子湖一带及青年大道沿线两侧。武昌主要分布在环南湖、汤逊湖、中北路沿线及杨春湖、严东湖。汉阳则主要分布在北太子湖和墨水湖之间地带以及汉江南岸。

20世纪末，通江湖泊全部被阻断，武昌的东湖、沙湖、南湖被隔开，汉阳墨水湖和太子湖分开，汉口仅小湖泊零星分布。2010年，武汉城区湖泊由建国初的127个锐减至40个。50年间，近百个湖泊人间“蒸发”。杨汉湖、范湖等耳熟能详的名字成为

仅带“湖”字的符号，范湖就从一个湖泊变成了一个都市中心王家墩商务区。更多的大小湖泊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永远消失在岁月的河流中。

同时，湖泊水质污染日益严重，沙湖、墨水湖、北湖污染尤甚。据环保部门对主城区湖泊的水质监测，全市没有一个湖泊的水可以直接饮用，主城区的绝大部分湖泊已不适合游泳，甚至养的鱼也不宜食用。而在建国初期，武汉市90%的湖泊水可直接饮用。

保护湖泊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面对湖泊数量的急剧减少和面积的日益萎缩，武汉市民发出了“拯救湖泊”“保护我们的家园”呼吁。2002年，长江日报刊发系列报道《救救湖泊》，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等各大媒体也争相报道各种侵占湖泊的行为，并设立投诉热线。1998年的特大洪水，再一次勾起人们对湖泊的怀念。也正是这一年，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约而同地撰写议案、提案，振臂疾呼“保护湖泊”！

1999年，市政府颁布《武汉市保护城市自然山体湖泊办法》。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政府规章，其出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规模填占湖泊的行为，但效力有限。市委、市政府从战略高度出发，决定出台保护湖泊的法规。2001年2月，立法工作正式启动。由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市水务局、市规划局等部门联合组织的专班人员，展开了为期半年的调查研究。在调研的基础上，市政府出台《武汉市湖泊保护管理办法（草案）》。2002年1月，湖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批准《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由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

然而，保护湖泊单靠立法还不够，就在《条例》公布实施后的两个月内，填湖行动仍在继续。2002年5月中旬，仅市水务部门查扣的填湖车辆就有8辆之多。严峻的现实告诉人们，保护湖泊是一场持久的“硬仗”。许多长期从事湖泊保护管理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也承认，尽管有了法，想保护湖泊依然存在着一连串的“拦路虎”。

首先是武汉的湖泊没有制定过保护规划，甚至连界桩都没有。湖泊到底有多大面积，湖区以哪里为界，谁也说不清楚。在这样的境况下，管理起来尴尬难免。其次是中心城区27个湖泊中大多数水质严重恶化，缺乏保养，保护力度大打折扣。对此，有人提出将其全部建设成公园。

市水政监察部门是湖泊保护的执法主体，但这支人称“湖泊警察”的队伍实在弱小。水政监察支队从事湖泊保护工作的仅有6个人，而各城区监察大队从事这项工作的大多2至3人。以这般有限的力量，即使日夜不息地运转，偌大的湖区又怎么跑得过来？

更糟糕的是执法难度太大。填湖按规定最高可处5万元罚款，但许多农用车主一旦接到罚单，干脆弃车不要。一台破旧农用车充其量不过几千元，而按照《条例》，填湖还应该追究责任单位、责任人的责任。但谁来追究？水务部门显然无能为力。只有全社会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制定湖泊保护规划，同心协力来捍卫《条例》，武汉的湖泊保护才能迎来灿烂的明天。

《武汉湖泊》——探寻湖泊的“百科全书”

了解到武汉千年湖泊发展变迁史和湖泊管理所处的困境，眼见“百湖之市”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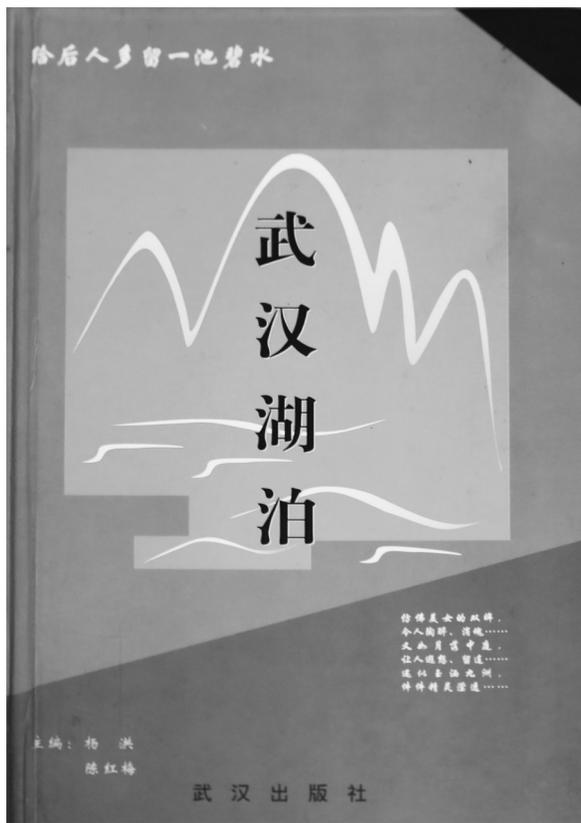
渐远去，作为一名怀有湖泊情结的市民我倍觉心痛，作为一名城建档案工作者我深感焦虑。在《条例》出台之际，我内心深处的使命感被激发了，决定将武汉湖泊的变化发展与保护足迹记录下来，并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

经过精心策划和研究，我们城建档案馆确立了编研项目，由我主持拟制《武汉湖泊》编写方案，力图编撰出一部具有学术价值和可读性强的“武汉湖泊百科全书”。该项目涉及面广，需要得到各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帮助才能完成。为此我给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涂勇写了签报，他非常重视，当天就做出批示：“此事很好，一定要组织好、落实好。”

我们很快就投入到调查、核实、采访和编写工作之中。7、8月是武汉最炎热的时节，我们不惧炎炎烈日行走于江湖，对湖泊进行了现场查访。大部分湖泊的现状看起来还不错，但我们还是找到许多湖泊被填占的现场，甚至有的湖萎缩成了一个小池塘。水污染的情形也比较严重，有的水质很差，臭味难闻。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对主城区所有湖泊及远城区部分湖泊进行了踏访。如此深入的湖泊调查，此前在武汉还不曾有过。

通过调查我们收集到第一手资料 80 余万字，如各湖泊的基本情况与民间传说，还拍摄了大量照片。但我的目标不是数据、资料的简单加工与堆砌，而是要提炼、分析海量数据，面对现实中的复杂问题，提出科学设想和可行性建议。与其说是在编书，不如说在完成一项具有史料性、权威性、超前性，为当代和后人研究湖泊提供系统完整依据的编研课题。于是，就有了 2003 年出版的《武汉湖泊》这本书。

我认为该书最有价值的是“发展展望”



《武汉湖泊》

章节，通过对武汉湖泊现状、历史的考察，立足武汉发展现实，大胆推出武汉湖泊规划发展三大学术设想。近期，将中心城区 27 个湖泊改造成公园，在郊区湖泊周围垒筑绿化带。中期，以武昌东湖为核心，通过人工渠工程将武昌地区的湖泊连成片，构建“大东湖”。在江北，以汉阳太子湖为中心，也通过人工渠工程使汉阳湖泊水脉相溶，打造江北“大太子湖”。远期，在大东湖和大太子湖基础上，通过人工河、升降渠闸，让长江、汉水与武汉所有湖泊相通。这样，坐一条小船就可以游遍整个武汉。

今天，这些设想大部分变成了现实。毫不夸张地说，《武汉湖泊》是一部集图、文、表于一体，填补了武汉湖泊研究空白的百科全书。2006 年，这项编研成果荣获武汉市社会科学成果创新奖。

《水都武汉》——追寻湖泊文化之旅

踏访三镇湖泊、编辑《武汉湖泊》过程，让我了解到武汉湖泊以及这座城市许多鲜为人知的人文历史，越发痴迷于武汉湖泊之美和水文化的博大精深。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体验更有价值的生命旅程。对我而言，关注、挖掘、记录、研究湖泊就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同时，我也觉得任何事情只要喜欢，就会变得简单。

随着市委、市政府提出将武汉建成滨江滨湖城市，水资源受到空前的关注和重视，武汉的水资源逐步得到有效治理、保护和利用。2005年武汉申请到水资源专项。2008年，本着记载历史与传承文化的想法，



《水都武汉》

我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将探究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水资源、水文化、水战略。同时作为武汉市“213”人才，我申报了《对武汉水资源保护利用现状及其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课题，并得到相关部门的科研项目资助。

该课题体现武汉创建滨江滨湖、山水园林城市，实现“碧水蓝天”的发展战略特色，弘扬武汉的地域文化，科学研究、系统介绍水资源对兴市利民的重要性，揭示了保护水生态环境，实施有效治理、合理开发利用对社会生存发展的功能与作用。此项目的研究将武汉水资源的变化、发展和保护的足迹记录下来，为研究人类生存环境提供借鉴和参考。

该课题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概，全面系统介绍武汉水资源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主要对全市163条长度在5公里以上的河流进行研究，其中特别关注长江与汉江堤防整治加固、府河等连江支堤整治、两江四岸景观建设等。第三部分是对全市166个湖泊全面扫描，重点对东湖、月湖、汉阳六湖连通进行深入研究。第四部分对武汉273座水库的现状与作用进行分析。这些水库与湖泊一样，体现了生态、调蓄、养殖、灌溉、发电、景观等功能，在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部分是水生态修复研究。主要对江湖连通工程、清水入湖、水污染治理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并提出学术设想。

经过两年的采访、调查与研究，我完成了《水都武汉》课题的编研，并于2009年结集成书。同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对武汉水资源保护利用现状及其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论文。2010年，《水都武汉》一书被评为武汉市地情资料类一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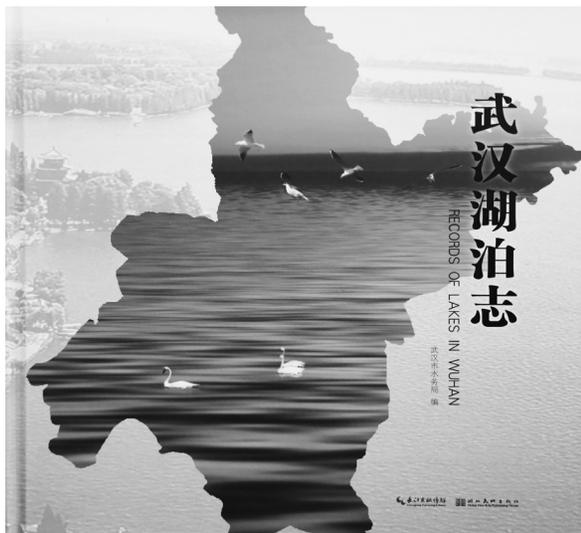
《武汉湖泊志》——为湖泊建档立传

湖泊是武汉竞争的软实力，也是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持久动力。2012年5月召开的市长办公会议，提出要为每个湖泊建档立传，由主管湖泊的市水务局负责此项工作。为编撰出全市人民期待的高水准湖泊志，水务局邀请了7家具有相关课题编研能力的企事业单位参与投标。基于《武汉湖泊》《水都武汉》的编撰经验背景及操作性强的措施，我们城建档案馆的方案一举中标。

时间改变了一切，见证了一切。近年来，武汉以建设“两型社会”示范区为契机，高度重视湖泊的规划和保护工作，先后制定多个针对湖泊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2014年，武汉市为加强生态保护实行更严格的考核问责，各区所辖范围内如发生填湖、破坏基本生态控制线造成恶劣影响的，年度综合考核将被“一票否决”，确定为不达标单位。

在湖泊污染治理方面，大力实施“清水入湖”“江湖连通”“湖湖连通”“一湖一景”工程，全面修复水生态、遏制水污染、保护水环境，打造水湖景观，在同类城市中率先制定湖泊“三线一路”保护规划，率先成立湖泊管理局。从出台《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到禁止非法填占湖泊行为，从为湖泊勘界立桩到制定保护规划，从新建污水处理厂到实施“清水入湖”计划，再到为城中湖泊截污等，种种有力举措使得武汉的湖泊面貌迅速发生变化。

当我们肩负使命感再次来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湖畔时，眼前生机勃勃的景象让我们感到陌生而惊喜，产生穿越时空的感觉。《武汉湖泊志》的档案收集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自2012年起历时近两年，我们



《武汉湖泊志》

对武汉166个湖泊的地理分布、历史渊源、水生资源、管理规划、治理修复、人文轶事等多方面的内容，进行全景式的资料收集，并于2014年编辑成册。

作为我国首部地方湖泊志的开山之作，《武汉湖泊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全市166个湖泊进行了全面、翔实的记录，被专家称为“百湖风情，一书尽揽”。该书充分挖掘与彰显了武汉百湖之市特色，填补了武汉湖泊史编撰的空白，对抢救与保存历史、研究与认识湖泊、供鉴与资治、指引与带动旅游具有重要意义。

掬一捧湖水，揽一缕清风，在湖光山色中滋养心灵，放飞梦想。这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湖铭志、以湖铭城所展现出的浪漫情怀。因为20年间主创出版武汉湖泊系列图书，我多次被机关、学校、企业、社区邀请作湖泊专题演讲，宣扬武汉湖泊及水文化，并获得武汉市爱湖护湖先进工作者称号。何其荣幸，此生愿做武汉湖泊的代言人！

（陈红梅：武汉城市建设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清末湖北新型知识分子与辛亥武昌首义

◇ 张笃勤

所谓湖北新型知识分子，在清末主要是指受过西方新式教育和文化熏陶，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人生追求上都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青年知识分子。根据各种资料综合估计，到武昌首义前，武汉地区约有新型知识分子近 20000 人，他们是倡导改革和革命的主导力量。没有这个新型群体的出现，辛亥首义的酝酿发动和湖北军政府的创立是难以想象的。

湖北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特征

清末湖北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员组成：一是由传统士大夫通过接受新式教育或从事与近代新型事业相

关职业转变而来的具有西学、新学知识的文化人；二是由国内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在校生和毕业生；三是在外国驻华教会所办学校就读的高年级学生及毕业生；四是出国及归国留学生。他们对近代西学中包含的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所涉猎，这与旧式知识分子见闻固陋、眼光狭窄、不切世用大不相同。如新式学堂的学制和教学方法仿照近代西方国家教育规程，学习的内容也是中西兼顾。尤其是那些出国留学学生，除了学习掌握各自选定的理科、工科、教育、法政、军事、医学等专科专业知识外，都耳闻或目睹了留学国家的社会状况与政治法律制度，对西方的社会理论学说有一定了解。

从社会身份上看，新型知识分子已不再是封建官府的附庸，而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群体。新型知识分子由于拥有新的文化知识，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新的行业、部门、职业越来越多的社会背景下，进入教育、工业、商业、

财会、医务、律师、新闻、出版、艺术等行业任职就业，从而决定了他们与旧式士子相比，不仅在身份和职业上不同，人生价值追求也不一样。旧式士子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盼望做官为宦，上使朝廷晏治，下使黎民安乐，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追求。与此相联系，旧式士子对皇权和官本位有强烈的倾向性，形成了对权力盲目崇拜的集体意识。

新型知识分子拥有新知识和新技能，获得了在新行业任职谋生的新手段，他们不再依附封建政权施展抱负，也不必以教读老死乡里，所以在政治上与朝廷官府逐渐产生疏离感，对儒家经典和政治权力的迷恋也就逐渐淡化，并且逐步学会用新的价值观念去观察、思考各种社会现象。在世界潮流的感召和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众多新型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士志于道”的传统积淀转化成了忧国忧民、改革社会的志向和要求。这是新型知识分子不满国内现状，鼓吹社会政治改革或反清革命的文化理论基础。

湖北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行为有如下三大特征：



起义新军士兵

其一，是强烈的爱国热情。

这是他们对清王朝失去信心后转向民主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目睹虎视鹰瞵的外国列强，回望瓜分豆剖的中国现实，具有忧国忧民传统基因的新型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奔走呼号。然而，腐朽昏聩的清王朝像是扶不起的阿斗，已经丧失了保国卫民的基本功能。当对清王朝通过体制内改革实现振兴的希望变成失望之后，甚至当报国无门、爱国有罪之时，广大爱国志士因激愤转向反清革命，1903年的拒俄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

1903年4月27日，为抗议沙俄无理继续驻军我国东北，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的无理要求，旅沪18省爱国人士千余众在上海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谴责沙俄背约拒不撤兵的可耻行径。4月29日，留日学生500余人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拒俄会议，成立拒俄义勇队，推举湖北留学生、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蓝天蔚为队长，率队操练，准备径投北洋，加入对俄作战。他们并派代表回国，号召动员国内民众一起行动。不料清政府逮捕回国代表，清驻日公使勾结日本警方，勒令解散拒俄义勇队。5月2日，留学生在锦

辉馆又开大会，通过了重要“规条”：“第一，定名：学生军。第二，目的：拒俄。第三，性质：（甲）代表国民公愤；（乙）担荷主战义务。第四，体制：在政府统治之下。”又在第七条“军纪”中规定：“谨守秩序”、“服从命令”等。

这次运动本来是一次纯粹的爱国斗争，不料在7日，日本政府外务省与清朝留日学生监督汪大燮以此事“于国际上有碍”为由，命令学生军停止操练！学生军于是再次集议，拟改名为军事讲习会。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却勾结日本政府，一方面强制解散学生军，一方面致电两江总督端方：“东京留日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飭各州县严密



《湖北学生界》第一期

查拿。”蔡钧同时密折上奏清廷，称留日学生“托拒俄以谋革命，其用意与唐才常相似，而党羽较密，编练尤严格。”

清廷接到密折后，在上谕中甚至明确提出，“朕以为该学生等既反叛朝廷，朝廷亦不得妄为姑息。”命蔡钧与汪大燮“于在日本东京留学生，即可时侦动静。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在此情况下，“学生等以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痛哭流涕。”为了反抗阻挠爱国的清政府，广大爱国人士转向革命排满道路。

在武汉，于5月初武昌曾公祠聚会抗俄之后，由吴禄贞发起组织的武昌花园山机关初步形成。在日本，原武昌两湖书院学生黄兴被委派为运动员，负责回国发动两湖和南京一带群众，同时派湖北籍人余德元为湖北运动员。6月初，黄、余等人回到武昌，在两湖书院发表演说，鼓吹反清革命，散发《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刊4000多册。

其二，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使命感。

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沉痛指出：“鸦片战争而后，寻而开五港，寻而弃安南，寻而弃台澎，失朝鲜，寻而割广州，割胶州，割旅顺、威海、大连湾，今则瓜分之图，明异其颜色，势力之圈，公言其保护。岁异而月不同。广西、东三省，行将择吉拱手恭送于大法国、大俄国好朋友矣，诸君得无有以事关政府、事属边陲、事在未成，而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者？夫惟中国之国民不知其国为人民共有之一物，而奉其无上之主权于少数愚顽之政府，是以政府欲保存之，斯保存之，政府欲割弃之，斯割弃之。自放弃其主人之权利，不闻一尽监督之义务。”

湖北新型知识青年首先意识到湖北在

灾难深重的祖国所处的重要地位。在日本出版的《湖北学生界》刊登这样的文字：

吾楚昔之为天下重也，不过割据时代以及内乱冲突取其地居上游，足为用兵之孔道而已。若夫外侮纷乘，则皆战之于门户之外，三十年来，海上构兵，沿海诸省首当其冲，吾楚以处堂奥，始终未与其患。……然锁国时代之楚与开通时代之楚异，通商伊始之楚与门户洞开之楚异。今日之楚，乃因各国竞争之局势，而重其价值者也。

具有历史担当精神的湖北新型知识青年，面对“震天撼地之风潮”，并不胆怯失望。他们认为：

“吾楚位全国中心点，为他人演剧之舞台已若是矣，由中心点而旁引于众方面，则吾全国焉往而不为他人之舞台也。虽然，竞争风潮之所趋，惟甘为傀儡任客之所为，故权利为人所侵耳。若因机利导，奋起直追，则彼之磨牙吮血、竞争之不遗余力者，夫岂知适以助吾之进化焉？由前而言，吾国最重最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吾滋惧焉。惧吾楚之为各国饵也；由后而言，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变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吾亦滋惧焉，惧吾楚无以副天下之望。”

他们认为，“中国沦亡，不在凡民而在学生”，因此以救国救种的重大使命自期：

学生生于二十世纪之竞争中心点中国者，胡为乎？将曰鼓铸国民之资格，生存黄帝之子孙，以与搏搏大地之强族争雄长权也。吾楚位于中国，缩汇东南半壁，其将来受竞争也必尤烈，而所恃以生存之国民何在，学生诸君非其代表耶？

……观海外之文化，念故国之沦胥，故希望诸君者日益急。乃回首乡关，楚天云黑，荆襄霸气销斲几尽，诸君栖息其中，知必有一种悲愤纵横之气盘郁于胸而不能自

由者。倘盘郁听其盘郁，则学生之天职未尽。匪惟无益于时，且为世诟病，中国前途尚有望乎？

青年留学生自豪地认为，社会上下都看重学生，自动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学生如此其可贵，故知为吾楚启山林者在诸君，为中国谋独立者在诸君，为将来世界做主人翁者在诸君。”

其三，是眼光向下的民众情怀。

从这批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思想倾向看，大多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其中不少人出身于贫寒之家。他们接受了若干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和社会学说，如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以及民主共和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列强蚕食鲸吞、清廷腐朽昏聩的社会现实刺激下，很容易奋不顾身地走上革命道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这些新型知识分子脱掉长衫，深入社会下层，不惜与会党、兵士为伍。武昌首义志士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武汉各革命团体，除了向社会宣传爱国救亡、革命排满的思想观念外，在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方面，第一是联络秘密会党，第二是投身营伍，秘密发动新军倒戈。

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两湖革命党人从中看到会党在长江流域的潜在势力，及其乐于接受革命党人领导共同反清的政治意向，遂更多关注会党，把联络会党与运动新军并列为发展革命力量的两大战略任务。1904年7月，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成立后，为策应华兴会起义，便“议派吕大森、高建唐往施南，何季达往荆宜，联络会党。”1908年，湖北共进会建立之初，更把工作重点放在运动会党上，甚至为了吸引会党，不惜将同盟会纲领中“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清末朝廷编练洋操、洋械的新式军队，

目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然而，令清廷始料未及的是，在革命党人的运动之下，武昌首义爆发后，掌握洋枪洋炮的新军竟反戈倒向，成为推翻朝廷的主要力量。湖北新军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变化，是因为新军具有与旧军不同的特点。

湖北新军按照德国、日本的新式军队编制和训练科目操练，装备使用洋式枪炮，因此招收要求“实能识字、写字，并略通文理之人”。1902年，湖北新军中“识字者约可得半，至营官、哨官、哨长，绝无不识字者”。如工程营，规定入伍者为二十岁以下的识字者。其他各营的入营士兵，也必须有一半识字。因为当时科举即将停废，一般知识分子只能另谋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往日本等国留学，其次投考省城学堂，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所以当时秀才当兵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新军士兵整体文化水准的大幅提高，为其观察时局、感应风气、接受革命宣传提供了有利条件。武昌起义士兵汤启发在回顾自己参加新军的思想动机时称：“武昌为湖北省会，文明肇造，风气先开，加以张香涛先生建学堂，增军队，提倡有年，而智慧日广发达。启发生于斯，长于斯，耳目濡染于斯。忿汉族凌夷，恨满清横恣，颇有班超投笔从戎之志。”

1903年的花园山聚会最早确定了投身营伍、运动新军的革命方针。受花园山聚会的影响，1904年春，刘静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吕大森等聚会武昌，谈及革命进行谋略，他们认为“时至近代，政府武力虽不足恃，但凭无饷无械无训练之乌合众扑之，未有能制胜者也”，由此得出结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胡瑛、张难先投工程营为兵，运动同伍，密散革命书册。是时秀士入

营者颇多，如朱元成、范腾霄、曹进等皆是，刘静庵则已在马队营入伍矣。”

湖北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革命活动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重大事件，极大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孙中山回忆称：“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在东京参加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的共72人，其中就有湖北籍19人。另据统计，头两年在东京参加中国同盟会的17个省会员863人，其中以湖南人最多，凡157人；其次是湖北籍，有106人。

早在东京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1905年初成立的欧洲同盟会，就是以湖北留学生为主干的。1905年初，孙中山回到英国伦敦，与湖北留学生魏宸组等函约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相见。孙中山抵达后，下榻于湖北籍留学生史青寓所，向留学生畅谈三民主义基本精神。湖北人朱和中向孙中山谈及唐才常成立自立军在汉口起事失败的经过，提出革命起义必须知识分子参加，不能依靠会党。孙中山起初不赞同这一说法，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起义，起事只有依靠会党。经过三天三夜的辩论，孙中山终于被说

服，乃决定在留学生中发展革命力量，于是组建欧洲同盟会。当时在布鲁塞尔加入同盟会者30多人，后在德、法两国又有留学生30多人入会。布鲁塞尔的史青寓所日后成为中国同盟会驻欧通讯处。

1906和1907年，一批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湖北革命党人先后回国开展革命活动，余诚、孙武分别以湖北同盟会、湖北共进会的名义发展革命力量。

湖北共进会源于1907年9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1908年冬，革命党人孙武由日本归国后开始在湖北活动。1909年3月，孙武在汉口建立共进会总部，联络长江会党。后来经过比较，孙武认为：

运动官吏，官吏利禄熏心；联络会党，会党又野性难驯；今后惟有运动士兵，借矛夺盾。士兵自有枪械，是器械足；各有固定饷粮，是粮饷足；每日操练，是有纪律；又曾平匪治乱，是有历练。与其费资养人，不如运动士兵为妙。

于是湖北共进会也把运动的重点由会党转到湖北新军，对军队内的共进会组织作了重大改动，即按清军编制，于队、营、标各设代表，分层负责。各单位会员，二十人为一支队，设正副支队长；每三支队为一正队，设正副队长；每一正队设参谋和书记兼交通各一人。所有军队同志，编成六个军。这一计划因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湖北形势紧张未能实现。

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争取过来，变为革命党手里推翻清廷的武装力量，这就是被首义志士概括提炼出的所谓“抬营主义”。通观武昌首义酝酿发动历程，两湖革命党人在武汉开展的活动与所建立的革命团体，从武昌花园山聚会开始，中经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湖北分会，

一直到共进会、文学社，无不实行“抬营主义”。经过七八年坚持不懈的宣传组织，反清力量在湖北新军中不断发展壮大。据湖北新军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士兵、文学社社员万鸿喈回忆，文学社曾于1911年7月在武昌小东门内开会，“检查在军队中发展组织的情形”，得到的统计数为：

第四十一标和第三十一标为最多，约十分之二；第二十九标和第四十二标十分之一以上；第三十二标和第三十标十分之一；工程营、炮标、马标都在十分之一以上；混成协的炮、马两营以及坛角的辎重和工程两队，也是十分之一以上；各处仍在积极发展中。

到1911年秋天，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的政治分野，大略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

万氏所说“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应当指文学社成员。按照《前文学社同人公启》的说法，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仅文学社的参加者就有三千余人。如果加上共进会成员，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当在五千之数。再加上同情者，革命势力在新军中已占明显优势。这是湖北新军能够反戈一击，成功发动武昌首义的主要原因。湖北新军的倒戈起义，归根到底是革命新型知识分子秘密投身营伍，长期坚持不懈发动组织的结果。

（张笃勤：原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罗马尼亚话剧《失去的信》在汉排演一波三折

◇ 庄桂成 赵亚琪

1958年5月，根据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文化交流协定，武汉话剧院接受文化部委托，公演罗马尼亚古典名剧《失去的信》数十场，获得极大成功，圆满完成文化交流活动任务，罗马尼亚媒体争相报道，剧院收到罗马尼亚朋友热情的贺信。

鲜为人知的是，这部五十年代排演的外国话剧，其筹备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

《失去的信》是罗马尼亚文学巨匠卡拉基尔的一部代表剧作，其基本情节是：罗马尼亚边远小城举行地方选举，政治流氓卡佳文古利用捡到的一封情书，威胁市长铁巴坦斯古及情妇拉伊，从中讹诈以图选举获胜。选举本身是一场闹剧，一群腐败无耻之

徒暴露了丑恶嘴脸，使人感到所谓的民主政治充满了欺骗。

确定武汉话剧院排演《失去的信》，始于1957年1月10日，文化部办公厅发函武汉市文化局，要求根据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文化交流协定，指定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排演《失去的信》。但是，两个多月过去，文化部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为此特意发文催报排演《失去的信》的计划和上演日期。

武汉市文化局：

我部前于1月10日以(57)文艺戏字第15号函通知你局，请督促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速报排演罗马尼亚古典剧《失去的信》的计划和上演日期，迄今未收到你局和该院的报告。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将派遣戏剧专家一名来我国访问，再度提出在我国上演此剧的问题，并表示同意给以艺术上的帮助

和指导。案此剧自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推荐以来，已近三年；事关国际文化协定的履行。望你局再督促剧院于本年度内上演，并请在4月上旬将排演计划及上演日期报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

1957年3月29日

对于文化部第一次来函，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没有及时回复，原因是正值剧院分拆为武汉实验歌舞剧院和武汉话剧院两家，新的武汉话剧院忙着建院工作，当年创作演出计划亦须相应修订，并在建院之后随即到重庆巡回演出，难以顾及呈报《失去的信》排演计划。

收到市文化局转来文化部第二次来函之后，武汉话剧院当即于4月19日制定了排演计划：

关于排演时间，考虑到5—9月为本院新剧目第一阶段排演时间，此间武汉气候酷热影响排演效率，9月又将外出巡演流动性大等因素，拟将这一有关国际文化交流剧目的排演时间，安排在1957年10月至1958年3月，演出时间预定为1958年4月。这样，也能赢得时间收集资料好做充分准备。

关于罗马尼亚戏剧专家来汉时间，希望能自始至终全程指导，至少在研究剧本及连排、彩排、修改阶段前来，以保证排演质量。

二

文化部艺术局收到武汉话剧院排演计划后，立即与对外文化联络局联系。但得到的答复是，罗马尼亚戏剧专家来华系访问性质，只能逗留一个月，要求武汉话剧院就具体日期提出意见。《失去的信》上演时间由于罗马尼亚方面已迭次催询，要求尽可能安排在本年度。同时，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已



《失去的信》专辑

寄来《失去的信》的导演手册、剧照及相关资料，翻译问题也在协调之中。

为此，武汉话剧院重新制定了排演计划：排演时间提前到6月下旬，11月下旬进行最后彩排并开始公演，要求罗马尼亚戏剧专家于1957年10至11月来汉指导。另外，关于《失去的信》的中译本，只找到上杂出版社1953年的译本，希望文化部确定是否可用或提供新的标准译本，以在时间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保证按时排演。

文化部艺术局立即就该计划、译本和资料问题回函：

武汉市文化局：

(57)文艺字第611号来函收悉，关于邀请罗方专家于10至11月间到武汉话剧院指导事，正与对外文化联络局进行联系。关于该剧的译本问题“上杂出版社”五三年出版的俞元咏的译本是现时国内仅有的译本，而且对外文联局翻译人员认为该译本的质量较好，可以作为演出本。另有关排演此剧所需的参考资料，正在加紧翻译中，现将

已经译完的一部分（《导演手册》中的第一幕）寄去请转交剧院，只供参考。其余的当陆续寄到。

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

1957年7月6日

此后，武汉话剧院陆续收到《失去的信》导演手册和第二幕至第四幕的译稿及剧照。

关于罗马尼亚戏剧专家来汉时间，对外文化联络局考虑，该剧既于六月开始排演，届时当大体确定了整个艺术风格，因此建议具体日期定在最后排演与首演之间，以免影响既定的排演日程和整个艺术风格的统一。

三

原本可以顺利启动的排演，忽然又出现一些变故。9月9日，武汉市文化局给文化部艺术局致函，请求将《失去的信》的排演日期延至第二年春天：

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

我市话剧院在今年的生产计划中，曾根据中央指示，安排了罗马尼亚古典话剧《失去的信》的排演工作。我局曾于6月20日以（57）文艺字第611号报告说明了排演演出日期，并请罗马尼亚戏剧专家于今年10—11月来该院指导。现该院已开展反右派斗争，根据中央及市委指示及该院具体情况，预计这一斗争将持续很长时间。在反右斗争期间，以开展运动为主，业务活动为次。如此，则原计划必须作重大改变。今年年底以前不能进行在时间上比较连贯的排演。考虑到罗马尼亚专家逗留时间很短，应该为之安排连贯、完

整的排演时间，但反右派斗争又必须取得彻底的胜利。为此，我们请求中央文化部批准并商请罗马尼亚方面同意，将《失去的信》排演工作延期至明年初开始，请罗戏剧专家改于明年4—5月间到武汉话剧院进行指导。以上请求是否可行？望早日批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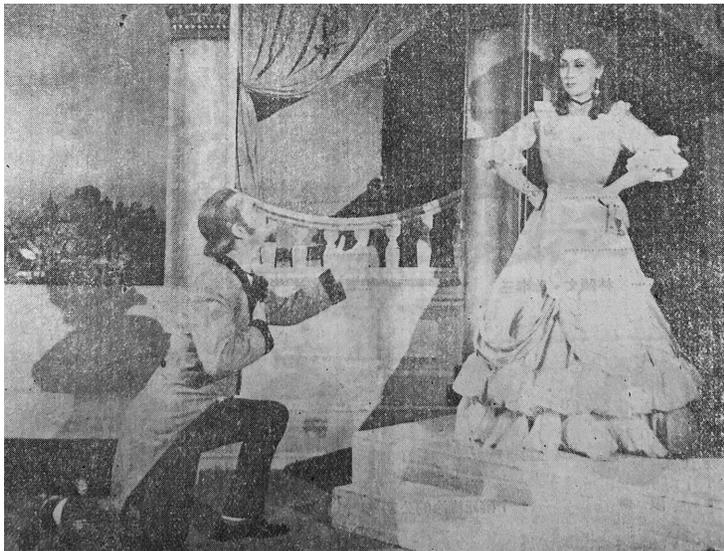
武汉市文化局

1957年9月9日

此函得到文化部认可，武汉话剧院1958年开始排演《失去的信》，并决定5月12日公演。可是，罗马尼亚戏剧专家却迟迟没有前来。在武汉市文化局发函催问之后，文化部艺术局4月29日告知：经我国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与罗马尼亚驻华使馆联系，确定为5月中旬，因此要求将排演日期推后。

四

最后，武汉话剧院将《失去的信》公演日期定为5月26日，文化部艺术局也明确答复：将请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再度敦促罗马尼亚专家尽可能于公演前来汉，如果届时不能赶到，武汉话剧院可按期上演。



《失去的信》公演剧照

为此，武汉市文化局作为《失去的信》主办方，积极筹划准备工作，提出工作计划：

其一，组织分工。由市文化局、对外文协武汉分会、作协武汉分会、剧协武汉分会、市外事处、武汉话剧院组成演出委员会。市文化局局长巴南冈担任主任委员，剧协武汉分会主席骆文、武汉话剧院院长吕西凡担任副主任委员。演出委员会设办公室，负责观众组织、宣传、接待等工作。市文化局艺术科刘克中等二人负责观众组织工作，黄毅、喻叔明等三人负责宣传报道及组织座谈会、报告会、展览会、外宾接待等活动，尤光等二人负责演出工作；武汉话剧院朱矩元任办公室秘书。5月26日起，在中南剧场演出20场，武昌演出10场。

其二，报刊宣传。演出前，报道武汉话剧院排演、罗马尼亚戏剧专家来汉、罗马尼亚文学艺术活动报告会等消息。演出当天，专版发表文化部、市文化局领导和罗马尼亚戏剧专家文章，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简介（附地形图），骆文撰文介绍罗马尼亚文学艺术活动，介绍剧作者卡拉基尔、剧情及主要人物。演出第二天，报道见面会情况。演出结束后专家离汉，报道演出情况和专家在汉活动。演出期间，作协武汉分会组织评介文章二篇。

其三，举办报告会。报告会由骆文介绍罗马尼亚文学艺术活动情况，时间安排在演出前一周，武汉讲演馆负责组织，参加对象主要为社会文化工作者、工会和共青团宣教干部、高校文学系师生、中小学历史和语文教师、文艺爱好者等。

其四，召开观众见面会。见面会时间安排在首场演出前一小时，地点在中南剧场，内容为：巴南冈介绍罗马尼亚戏剧专家（或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代表）并致词，请罗

马尼亚戏剧专家（或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代表）讲话，演出代表献花。

经过全市多部门通力合作、精心组织准备，《失去的信》由莫先铨导演，卢荻、胡庆树、晏修华等人主演，卢荻饰演行政长官史坦方·铁巴坦斯古，胡庆树饰演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战士”阿格孟能·唐达挪克，晏修华饰演小组委员会主席柴哈里耶·特拉哈挪克，陈牧饰演“罗马尼亚经济曙光”综合合作社创设人兼社长挪伊·卡佳文古，其中当差、选举人、公民、群众等演员均由话剧院演员担任。

话剧公演后获得极大成功，受到了文化部、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当年8月，文化部艺术局再次给武汉市文化局发函，称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希望8月23日罗马尼亚国庆14周年时，武汉话剧院能再次上演《失去的信》一场或数场以志庆祝。

文化部之所以委托武汉话剧院担任这一国际文化交流重任，源于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实力雄厚，此前已成功演出《20世纪中叶》《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锦绣花巾》等外国剧目，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而且以喜剧风格见长。《失去的信》恰是一部讽刺喜剧，激起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和艺术活力，使之不仅获得良好反响，也成为武汉话剧院的保留剧目。

（庄桂成：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亚琪：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张金保：纺织女工主持党的五大闭幕式

◇ 陈礼才

1927 年的江城武汉，大革命高潮波澜起伏，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4 月 27 日召开。一位普通纺织女工，不仅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结束时担任执行主席主持闭幕式。

她，就是来自硚口日资企业泰安纱厂的共产党员张金保。

张金保的革命生涯充满传奇色彩：两次被捕坚持地下斗争，缺席中共六大当选中央委员，反对王明路线被开除党籍，出席七大参加开国大典。

光荣入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

中日甲午海战之后，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日商可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工厂，产品免征各项杂税并就地设栈寄存。此后日商大量来华办厂掠夺财富。其中，染指汉口的日信洋行，看中汉水河畔宗关水厂东南侧地块，于 1923 年动工开办泰安纱厂。

1924 年，泰安纱厂投产不久，中共地下党就在厂里发展组织建立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是侯步升。侯步升又名侯甫堂，武汉纺织总工会常委，泰安纱厂工会委员长。1927

年七一五事变后被捕，1928 年 1 月 20 日被反动派杀害于汉口济生三马路。

侯步升发现张金保与众不同，她总为工人说话，热情为工人办事，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于是，在 1926 年春介绍她加入厂秘密工会，同年 8 月吸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

张金保原名张巧云，又名张毅，化名余冬生，祖籍湖北鄂州葛店张铁村，清光绪 23 年（1897）农历七月初七，出生于安徽芜湖一个船工家庭。1921 年 2 月因生活所迫，张金保到汉口谋生，经朋友介绍到裕华纱厂当学徒，后到武昌第一纱厂当熟练工，因不满工头打骂被迫到日商泰安纱厂做工。由于技术熟练又能出满勤，她当上了小工头。

1926 年 8 月 22 日，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占领岳阳，直逼咸宁汀泗桥。张金保根据党支部的决定，发动工人四处宣传，制造革命舆论。北伐军攻克汉口的当天，泰安纱厂工会正式成立，张金保当选工会干事。工友们见张金保敢说敢为，又选她为女工纠察队队长和裁判委员。随后，张金保担任中共硚口区党委委员。

从此，张金保与厂里的党员一起，带领工人搞募捐，组织宣传演出，慰问北伐军，

创办工人夜校，组织劳动童子团，发动中下层女青年剪发放足，一心扑在工会工作上。

1927年1月1日，张金保作为泰安纱厂工会代表，出席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厂工会常委兼女工部长。3月8日，汉口特别市委召开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张金保应邀上了主席台，并受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的委托，代表省总工会在大会发表讲话，受到与会妇女赞扬。当晚，国际妇女会代表送给她一面红绸大旗。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金保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结束时，张金保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主持了闭幕式。

6月18日，党在血花世界（民众乐园）召开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张金保又作为武汉纺织工会的代表出席大会。

隐蔽地下，参与重建湖北省委

风云突变，汪精卫叛变革命，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大规模封闭工会、农会，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各级党的机关和革命团体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中共硚口区委安排张金保返回泰安纱厂隐蔽。此时，已停业的工人等了两个月还是没有拿到遣散费。张全保获知厂方已将遣散费交给武汉政府外交部情况后，即同厂里的党员商定，发动全厂工人将外交部包围了两天，直至外交部答应将遣散费如数发给工人。

不久，张金保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湖北省委秘密机关驻地武昌后城街32号，以“太太”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一天，张金保到法租界等地执行任务回来，发现机关附近有一个工贼游动，预感情



老共产党员张金保英姿

况不妙。她赶紧关上大门，跑上楼向领导报告，大家掩护带有重要文件的机关负责人老黄出走，张金保却和其他六位同志遭敌人逮捕。1927年冬，经党组织营救，张金保等人越狱脱险。

1928年春节前后，因叛徒告密和省委秘书长宋岳林叛变，省委机关两次遭敌破坏，张金保不得不回芜湖暂避。一个多月后，张金保变卖了娘家仅有的家产，带着100多元返回武汉，交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

1928年到1929年间，张金保在武汉以办袜厂作掩护，秘密串联地下党员400多人，建立联络站，为重建中共湖北省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30年3月，党中央派五大候补委员李震瀛、吴芳两同志来武汉重建中共湖北省委，张金保参加了省委工作，任省总工会常委。8月，总书记向忠发来武汉通知张金保：1928年7月，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因她化名为“余冬生”而未收到与会通知，但大会还是选举她为第六届中央委员。

1931年1月7日，张金保到上海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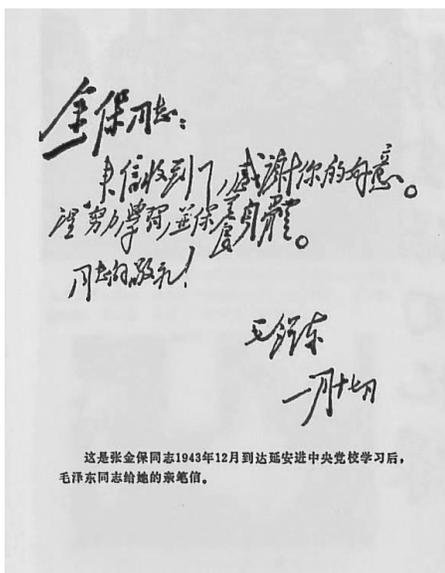
六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强行通过了共产国际米夫、王明等人事先写好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张金保因不赞成王明等人把持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被开除党籍。

1933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张金保被敌人逮捕，先后关押在上海、南京等地。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7年10月，张金保获释出狱。她坐牢四年零九个月，始终没有忘记党，处处以共产党员姿态，带领监狱难友同敌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表现出她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

奔赴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称赞

1943年9月，张金保接到党中央的通知到达延安，12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她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很快收到毛主席“望努力学习并保养身体”的亲笔回信。

1944年8月24日，中央批准恢复张金保的党籍。不久，毛主席和彭真接见了她。



毛泽东给张金保的回信

毛主席听完张金保的汇报，和蔼可亲地说：“好啊！在我们队伍里，还有你这么一位老工人同志。怎么王明打你，没有把你打跑呢？”张金保笑着回答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自己飞，我往哪里跑？我是无产阶级，只能跟共产党走！”这句朴实的话深刻地表达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对党的无限信赖和依恋。

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张金保恢复了中央委员的职务；4月23日至6月11日，她参加了党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9年3月，张金保从东北随军南下回到武汉，任武汉市工会筹委会副主任，后又担任中南总工会副主席、中南纺织工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21日，张金保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

此后，张金保担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全国总工会第七、八、九届执委兼女工部长，全国妇联第一、三届执委。

1984年11月7日，张金保在北京病逝，走完革命的一生，享年87岁。

泰安纱厂在1938年日寇占领武汉后，改为日军“十一军野战自动车厂”，为其侵略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军车提供服务。1949年武汉解放后，该厂由“四野”从国民党军队手中接管，逐步发展成为国家骨干汽车企业——武汉汽车配件厂。而从这片热土走出的张金保的传奇故事，一直是不断传承的红色资源，激励广大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陈礼才：曾任武汉汽车配件厂党委书记、湖北汽车集团党委副书记，现年85岁）

汉口总商会大楼百年风云

◇ 殷 莎

在汉口繁华的中山大道，有一座老楼与水塔相邻，不时有年轻人前来“打卡”。殊不知早在1921年，汉口总商会（现武汉工商联）迁此办公，至今已是一百年，历史的风云仍在发出回响。

民族工商业日渐发展

清代初年，汉口商务逐渐繁盛，各地和各行帮商人、手工业者和同乡人士在汉口建有行会、会馆和公所。清末汉口八大行业中，盐行名列前茅，年贸易额约四五百万两。19世纪初期，华茶几乎独占国际市场。19世纪60年代，汉口有六个茶帮，1871年，各帮会建立汉口茶叶公所。19世纪中期，汉口的金融组织在湖北、浙江、安徽团体中第一次进行合作，1871年这三个帮与江西钱庄合并成立汉口金融行会（汉口钱业公所）。

张之洞督鄂期间，先后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1890年，湖北织布局在武昌兴建。1891年，汉阳铁厂在汉阳兴建。1894年，湖北纺纱局、缫丝局在武昌兴办，湖北枪炮厂（1908年改称汉阳兵工厂）建成投产。1897年，湖北制麻局在武昌兴办。1902年，布、纱、丝、麻四局招商成办。1911年，武汉各类官办或官商合办工厂17个，总投资1300余万两。

近代民族工商业也随之兴起。武昌商人周仲宣在家传铁铺的基础上，开办周恒顺机器厂，相继生产出砖茶机、轧花机、抽水机、轮船等，创造了数个中国第一。浙江商人宋炜臣于1897年在汉口开办燮昌火柴厂，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厂。而后，宋炜臣出资筹办了汉镇既济水电股份公司。1906年8月，2万余盏电灯让汉口的夜晚一片通明，1909年4月，宗关水厂开始供水，汉口成为全国首先使用自来水的地区之一。浙江

商人沈祝三，1908年创办汉协盛营造厂，汉口总商会大楼就是汉协盛承建的。1911年，武汉共有民营工厂40多家，资本额约1000万元，连同外资工厂、官营工厂，数量达100多家。

汉口总商会应运而生

1898年，张之洞设立商务局，办理汉口全镇华洋商务事宜，并委任王秉恩为总办，系官办性质。1905年，张之洞撤商务局，饬设商会，派刘子涛为总理，邓季常为协理。1907年，商务局遵照部章，组织汉口商务总会，邀集各帮商董选出议董29人，再由议董推举卢鸿沧为总理，刘歆生为协理，全镇商务事宜均归商会办理，裁撤商务局。1916年1月，汉口商务总会改组为汉口总商会，俞清澄当选会长，王琴甫当选副会长。



汉口总商会大楼外观

1929年8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布新《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总商会一律改组为市商会，商会的会员改为各同业公会。1931年2月，汉口总商会改组为汉口市商会，贺衡夫当选主席。直至抗日战争发生，汉口市商会停止工作。抗战胜利后，汉口市政府指定人选，于1945年10月18日组成汉口市商会筹备会，同年12月16日又奉令扩大改组为汉口市商会整理委员会，并担负整理各工商同业公会的任务。1946年5月20日，正式成立汉口市商会。

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工业界人士纷纷自川、陕、湘、桂回汉。鉴于工业复员问题，在厂房租觅、机件添补等方面存在很多困难，1946年4月16日，成立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湖北分会，其后改名为湖北省工业协会。1947年10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布《工业会法》。凡已加入汉口市商会的各工业同业公会划属工业会会员，并筹备组织省、市工业会。食品、针织、机器、化工、印刷等工业同业公会，以及既济水电公司、华新水泥公司、汉口打包厂、燧华火柴厂、福华弹花厂等代表93人筹备汉口市工业会，1948年6月20日，举行成立大会。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在武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工商界建议成立工商业新的统一领导机构。武汉市人民政府同意此建议，并广泛征求意见，于1949年10月26日成立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筹备会成立后，1949年11月1日至3日，接管汉口市商会、汉口市工业会、武昌市商会及汉阳县商会。经过3年筹备期，于1952年11月24日至28日，召开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市工商联”）成立大会，出席代表488人，一致通过《关于号召全市工商业者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

动的决议》，通过《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章程》，选举了第一届执监委员会，陈经畬当选为主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市工商联受到冲击，停止活动。1978年5月，市工商联恢复活动。

百年老楼风云际会

汉口总商会办公地址先在商务学堂。1908年，张之洞拨汉口张美之巷后城马路西北（现为中山大道民生路对面）官地300方，建筑商会会所之用。1919年，向会员募集捐款，由汉协盛营造厂投标兴建会所，建筑费计洋例银91835两，1921年元旦投入使用。至今，市工商联（市总商会）仍在此办公。

一、支持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面对社会秩序大乱、部分钱庄被抢、商店被烧的严峻局势，武昌革命党在四官殿设司令部，邀请汉口商务总会的总理、协理和议董10余人开会，商讨恢复社会秩序的办法。决议五条：各商一律开市，所有台票、银钱票仍照旧通行，商会派商团团员协助士兵巡查街道，巡街者必须荷枪实弹，现有驻汉口革命军一律由商会提供给养。汉口商务总会每天以数百担的馒头，还有酱菜、牛肉等副食品供应军需。阳夏战斗开始后，革命武装不下数万人，其粮秣给养多由商会供应，救治伤病员1300余人。

二、支援抗日战争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随后的抗战期间，汉口市商会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先后为前线将士征集衣裤鞋袜1000余件，捐赠飞机2架、装甲车2辆、高射炮2台，并建立难民收容所50多个，捐赠大

米4000余担救济难民。1937年9月，政府发行救国公债，汉口市商会召开大会，汉口104个同业公会共摊认111.2万元。

对日经济绝交，是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卢沟桥事变初起，汉口杂粮油饼业即拒售粮食资敌。汉口市商会召集各业负责人开会决议，对已经定购之仇货，牺牲定款，断绝往来。各有关商店限期封存仇货，并由公会和商会加贴封条，造册备案。订定《取缔仇货办法》六条，严格监督，加强缉私。

1938年，在保卫大武汉热潮中，总商会大楼目睹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一幕幕壮烈场景。1月23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总商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各界人士千余人。2月20日，武汉各界在汉口总商会公祭殉国空军将士，蒋介石主祭。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隆重举行成立大会。4月15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商会举行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疾呼，要小朋友们在艰难困苦之中确定他的志向，锻炼他的精神，来做新国民，担负起复兴民族的大任。

三、支援抗美援朝

1951年5月，武汉市各界热烈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回汉。工商界群众在欢迎大会上听取了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报告，深受感动，当场自觉捐献慰问金达969,875,700元（旧币）。此外，在全国发动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救济朝鲜难民运动中，工商界捐献金达1,365,339,143元8角（旧币）。

6月7日至13日，武汉市工商联筹备会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在1951年内捐献飞机30架。10月25日，为了纪念志愿军赴朝作战一周年，提前完成捐献任务。计缴款总数为661亿元（旧币），折合战斗机44架，超额14架。

四、推动工商业改造

1950年武汉市政府对武昌第一纱厂进行公私合营，拉开了武汉私营企业公私合营的序幕。1949到1953年，武汉市主要对资本主义大企业进行公私合营。在此期间，共有31户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其中工业企业26户。

1953年，党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市工商联将辅导私营工商业逐步纳入国家经济计划轨道，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抓。1954年，武汉市有13家私营工厂和5家轮船局实行公私合营，连同原有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人数，已占全市私营企业职工总人数的70.96%。

1955年11月，市工商联各级组织参加公私合营的各项工作，仅仅2天时间，就完成了全市范围内数以万计工商业户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手续，并于1956年1月18日，全部得到政府的批准。1月22日，武汉市各界人民15万余人举行富有历史意义的庆祝大会和大游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五、为改革开放建言

改革开放以后，市工商联历届领导班子，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始终把参政议政、调查研究作为工商联工作的重要职能，建有用之言，献务实之策，为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提出许多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产生了积极影响。

1983年2月和3月，两次向市政府提出恢复和发展江汉路中心地段商业网点分布的21条具体意见，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江汉路商业一条街建设办公室。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江汉路发生巨变，商业门面由68个发展到173个，每天平均接待顾客10万人次以上，年销售

额达3.2亿元，占全市零售总额的十分之一，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一条街。

1992年10月，在市委“双月座谈会”上，市工商联作《关于加快我市私营企业发展十五策的建议》发言，得到市委书记钱运录的高度评价，催生了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武发〔1993〕6号）文件的出台。

2012年1月，市工商联在市政协十二届一次全会上作《关于突破性发展民营经济的建议》大会发言，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市工商联联合市经信委，主笔起草《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俗称“新56条”），同年9月，武政〔2012〕77号文件正式颁布实施。

2013年1月，围绕推动“新56条”政策的贯彻落实，市工商联在市政协十二届二次全会上作《推动“新56条”政策快速落地的建议》大会发言，并发市政协《社情民意》，市长唐良智作了重要批示，促成市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意见实施导则》《关于进一步深化全民创业工作的意见》3份文件的密集出台。2013年，在“新56条”政策的支持下，全市非公经济占GDP比重首次突破半壁江山，达51.5%，其中，民营经济达42.3%，比上年度提高1.1个百分点。

（殷莎：武汉市工商联二级主任科员）

湖北省立图书馆西迁记

◇ 彭余焕

为纪念湖北省立图书馆西迁 80 周年，笔者通过重走西迁之路，梳理查阅珍贵档案和历史照片，重现其百年馆史中艰苦备尝的浓重一笔。

西迁准备

1904 年 3 月，中国最早的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北省立图书馆成立，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已初具规模。然而，当人们站在花红柳绿的新馆前憧憬“湖北文化前途，亦必蒸蒸日上”时，意想不到年轻的图书馆日后蒙遭国难，走上一条曲折艰难的西迁之路。

1931 年侵华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地区图书馆的馆藏落入敌手。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除了对我国领土大肆侵占和疯狂掠夺外，对文化设施和文化资源

也肆意破坏践踏，作为国家公共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势必在劫难逃。

1937 年 12 月南京失陷后，武汉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国民政府虽然西迁，但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仍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1938 年 6 月 7 日，武汉警备司令部、省防空司令部为疏散人口发出《告武汉同胞书》，要求市民设法离开武汉。随后，湖北省省会西迁恩施，并要求各机关、学校、企业一并西迁。

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只要图书馆还在，人类的文明就还在。湖北省图书馆馆长谈锡恩四处奔波，在他的极力争取下，省馆终于列入先行西迁的行列，开始了紧张的抢运工作。据馆史记载，1938 年 6 月西迁前，省馆馆舍面积达 2005 平方米，馆员 17 名。各类馆藏文献达 14 万余册，包括线装书 9 万

余册，其中善本 3000 余册，以元、明版本居多，另有冠绝全国的崇文书局（湖北官书局）古书版片 75467 块。《武汉日报》1934 年 7 月 16 日报道，“警钟楼下各界民众多人，围集库前，翻阅书目，各就其性之所喜者，纷纷取阅，莫不人手一编……咸以游览之余闲，获读书之机会，称为快事”，当年省馆事业发展之盛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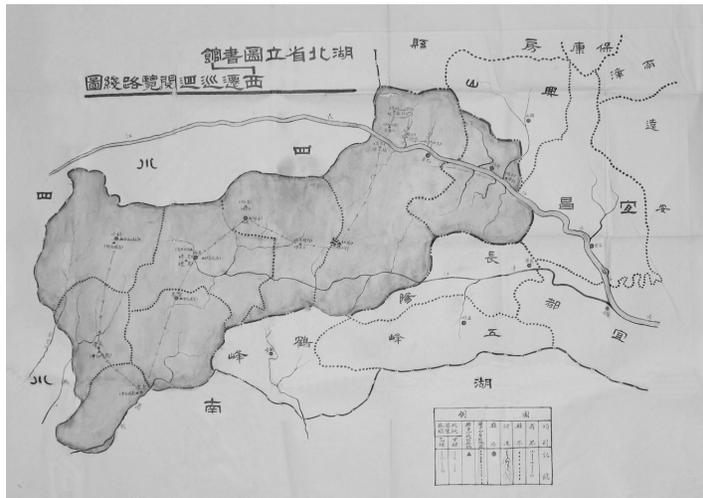
1938 年 7 月，省馆十余名员工在谈锡恩的率领下开始西迁，将馆藏古籍和中外文图书 98000 余册清理打包，装大木箱 173 个；同时将所藏崇文书局版片装木架 86 件，馆藏文献及相关物资合计约 36 吨。西迁古籍中，明刻本《宋元通鉴》、明钞本《鹿门先生批点汉书钞》《登坛必究》名列其中，可谓珍品云集。

谈锡恩曾说：我省的图书库藏丰富，不仅在数量上全国闻名，而且很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是国家的珍贵财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管好这些文献资料，让它发挥更大作用。如果我们不珍惜每本书、每张纸，那就是严重失职犯罪！

西迁之途

西迁之路，困难重重。1938 年武汉各车站、码头等待转运的物资堆积如山，湖北省立图书馆迟迟未入搬迁序列，图书上船受阻。谈锡恩多方求援，终于在船尾寻得一点地方，堆书的难题方才解决。书多人杂，谈锡恩马上安排职员打地铺，围睡在书箱旁日夜照看，每到晚上他还亲自巡查两三遍。

由武昌逆水西行，从 1938 年 7 月至 9 月，分三批到达宜昌。船到宜昌，堆放图书成了



1939 年 3 月绘制的湖北省立图书馆西迁线路图

大问题。谈锡恩通过熟人关系，才租借到一间行栈的房子。此时，武汉会战正在进行，宜昌也成了日机轰炸的重灾区。10 月 13 日，谈锡恩再次接到省教育厅继续西迁命令：

“为适应战时需要、实施战时教育起见，兹决定该馆迁至恩施设立，仰即派员迅往恩施觅定馆址，将所有图书妥为搬运，并积极筹划开馆；至崇文书局版片，俟运抵宜昌后，应就近觅安全地点妥善保管。”

谈锡恩致函省教育厅厅长请示：“厅长当蒙垂询，本馆移设施南情形，馆长以目下军事紧急，轮船汽车均感缺乏，大以该处为馆址，将运宜图书尽数妥运该处收藏……”当时已雇三艘大船，正准备到秭归新滩时，“适值江水暴涨，危险堪虞！馆长责任重大，似不能不出之谨慎，以俟水势稍杀，始敢起运。”

1938 年 11 月，所有书籍和版片由民生公司派出的小木船运至秭归县新滩镇。开馆需要的大众图书继续向恩施转移。珍贵图书、古籍善本和版片则存放于秭归、兴山两地交界的游家河岩洞里。崇文书局版片及收购的杨守敬藏书，运到小峡口岩洞隔溪相望的兴山屈洞乡兴隆寺。此间，谈锡恩给省政

府代主席严立三写了一封信，报告三处藏书地点并附上一张手绘的地图。三处藏点分别是：兴山县属大峡口内一岩洞，土名黑岩，从新滩水程七十里，从西麓上达该洞又有八里；兴山县属大峡口对岸一岩洞，因岩洞为庙，庙名滴水观，新滩至该观水程约七十里，上山又有七里；兴山、秭归交界处，秭归长云乡之小峡口岩洞，距离新滩水陆里程约六十里。搬运甚为方便，洞甚宽大，干燥，保无敌机土匪决难窥伺，适合收藏。

珍贵图书、古籍善本和版片搬到岩洞后，谈锡恩就带领馆员立即投入到开箱翻晒的工作之中。发现水湿受潮或虫蛀破损，都要仔细粘补复原。每箱图书都要编制图书目录一式六份，除一份随箱装订外，其余分别装订成册分别保管，便于日后查找。在樟脑丸难求的情况下，图书晒好装箱时，每放一层图书，用碎烟叶撒在每层书之间以防虫蛀。在整个翻晒过程中，谈锡恩多次现场督查，使得这一工作顺利进行。据相关资料，省馆借新滩北岸小学教室二间作藏书之所，又租杜氏宗祠作为临时馆址，内设第一阅览处并于1939年1月30日开放。在这里每天接待读者一百多人，坚持了一年时间。

图书版片等分两批运至恩施。第一批是1939年7月，普通书籍到达新滩后继续雇船运往巴东，走巴咸公路到恩施；第二批是1941年3月，古籍及版片由秭归游家河、兴山兴隆寺运到巴东，再经巴咸公路到恩施。

1940年9月15日，谈锡恩等6人从恩施馆出发转运古籍版片，租小船顺香溪河水运至长江边，再转大船，最后搭乘民生公司的“民勤差轮”及“同心差轮”

到巴东。古籍版片到达巴东后，再租用木炭汽车将书转运恩施。

抗战期间，随着省政府西迁，巴咸公路成了唯一一条通往恩施大后方的交通大动脉，所有转移人员、抗战物资及省府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都要通过这条公路进入。当时的客车，由于路况很差行车艰难，正常时速仅15公里左右，特别是因为战时汽油短缺，汽车改用木炭作为燃料，一般第一天仅到茅田，第二天才能到恩施。当时的公路并不宽，勉强可以通车，弯道很急，沿途有车站加木炭，司机带被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休息。

谈锡恩递交的报告中提及车辆配置情况：“本馆秭归岩洞图书，于去年十月运抵巴东，经钧厅函商湖北省政府建设厅拨车三辆，从事搬运在案，讵逾时四月，迄今尚未运竣。近查所拨车辆，五一六号已开赴咸丰总厂修理，七二二、七三六两号，均停放恩施车站，询其停放理由，以机件损坏等候器材修理为辞。”谈锡恩还在报告中请求解决经费问题：“自上年十月二十九日开始迁运，至本年三月三十一日业经运毕，共载运三十车，费用合共为七千七百一十七元伍角，仅



运送过古籍版片的民生公司“民勤”轮

付二车计银三百六十元。”可见迁运条件非常艰苦。

1941年3月31日，最后一批图书装车运抵恩施，从秭归到恩施水陆两程累计不到350公里，却花费半年多时间。据西迁日记记载，搬运过程大多数时间里就是等车、等人、等经费、等敌机停止轰炸……举步维艰。另据史料记载：日军在1939年到1941年，轰炸巴东24次，其中最多的一天20架飞机，炸死372人，炸伤800多人，炸毁房屋多间。日军轰炸频繁，图书运送只能在轰炸的间隙中进行，迁运条件异常艰苦。

在恩施的七年间，省馆在五峰山高农分校、土桥坝唐家湾、土桥坝店子坪、五峰山七里坪、舞阳坝邓家湾等地临时搭建开辟阅览室，辗转搬迁，数次扩建、兴建馆舍。1945年2月16日，省馆举行舞阳坝新馆落成典礼，次日正式开放。古籍版片在恩施妥善保存，直至迁复武汉。

迁复武昌

抗战胜利后，新任馆长张翮领导了迁复工作，将房屋、器具、重复图书拨交省立恩施州图书馆。

1946年5月14日开始迁复工作，回武昌的路同样饱历艰险。据馆史记载：因乘木船峡中滩多水急不安全，原计划图书版片由恩施运抵巴东后，请建设厅派专轮到巴东接运直达武昌，但巴咸路段车况极差，半个月才运抵巴东。因仅能行驶峡江的“建施”轮损坏滞留武汉大修，在巴东候船滞留长达两个多月。经反复与建设厅航业局联系交涉，7月29日图书、版片才由巴东陈家码头上到经黄蜡石开往宜昌的驳船“大豫轮”上。

船至宜昌后，转上排水量近百吨的大柏木船，由驳船“恩施”号拖带。此时正值汛期，船到湖北荆江水域藕池口附近，突遇狂风暴雨，两船剧烈颠簸，船舷并连处上下猛烈摩擦碰撞，连系两船的两根首缆之一被磨断，柏木船出现裂缝，江水雨水直灌船舱，物件箱笼倾倒。幸船长指挥若定，船员协力抢险，馆员余氏一家在舱内照料箱笼清除积水，合力施救，化险为夷。

1946年8月，省馆由恩施迁回武昌蛇山南麓抱冰堂下馆舍。《新湖北日报》报道：“此次迁复，为时三月有余，政府原允派建施轮赴巴接运，讫久未前往，该馆迫不得已，自行多方设法，饱历艰险，始行达到迁复任务。该馆图书多系善本，且不少还系孤本，兹幸安全到达，询足为湖北教育文化前途庆也。”

省教育厅后传令嘉奖馆长张翮：“该馆由恩施迁复武昌，各项公物虽经长途辗转搬运，均全整如初，毫无损失；足证该馆长珍视公物，事先计划周密，临时照料得当，应予传令嘉奖，用示鼓励。”

经四任馆长及馆员的共同努力，迁出的9万余册图书，因一路接收了杨守敬、张继煦等人的藏书，回武昌时居然增加到11万余册。据战后统计，整个搬迁过程中水渍霉烂图书193种662册，由于流通等原因遗失图书193种282册，是抗战期间损失最小的图书馆之一。

湖北省立图书馆的西迁历史，充分展现了老一辈图书馆人守土有责、守书有责、守文有责的家国情怀，他们对中华文化遗产做出的巨大贡献，将不断激励后人砥砺前行。

（彭余焕：湖北省图书馆馆员）